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逢星期六出版

第二卷上冊

第二卷上冊

本冊撰稿人

梁漱溟 傅斯年 錢端升 簡貫三
莊智煥 季羨林 錢鍾書 儲安平
吳世昌 蕭公權 戴文賽 雷海宗
李慕白 楊人楩 鄭林莊 吳元黎
陳衡哲 李純青 浦熙修 蔡壬侯
劉迺誠 笪移今 張嘯虎 張東蓀
楊　剛 史立常 伍啓元 張　銳
虞　愚 蔡維藩 潘光旦 全慰天
李廣田 王芸生 費孝通 周綬章
魏登臨 楊　絳 任鴻雋 李浩培
傅統先 張述祖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　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　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　至 程希孟 傅　雷 費孝通 楊　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illegible]賢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　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　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韋新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　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　乾 顧翊群

撰稿人

致讀者　　編者

從第二卷一期起，我們騰出這一頁來刊載讀者投書。但讀者投書時，希望是一封「信」，而不是一篇「文章」；不要長篇大論，最好二三百字，甚至寥寥數行亦可。紙價太貴，我們希望盡量經濟篇幅，俾能多登幾封讀者來信。

新疆綏遠的省名

編者足下：査新疆之名，定於遜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時回論方平，西陲粗定，設為行省，以便數化。殊不知「新」之含義，頗多語病，細味其意，一若其地方自闢封以武力攫奪據為己有者然。此殆數典忘祖，置漢代經營西域之史實於不顧，愧負豐功偉蹟彪炳史册之民族英雄（班超）（張騫）二公多多矣。讀左宗棠上清庭奏摺，其論該省，曾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幽燕，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各省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將無宴眠之日！……」等語，謀深慮遠，自是的論。謹按卅三年夏，美前副總統華萊士乘船來華，下機迪化，曾發書面談話，中有「……顧名思義，新疆之命名，是你們（意指國人）給它定的……」等語，措辭含蓄，言能深長，言外之意，頗堪玩味。前此顧頡剛先生於「天下」「文」雜誌中，對於該省亦專章敘述，指陳現狀，月旦人物，詞均驚人。並承認漢代政治勢力遠達西域之史實。（按：漢代史地家不稱「新域」而命名西域，自極精當。）「新」者，舊之對，既名其地曰新疆，則相對之義，毋乃自承其地非吾素有乎？此其不妥。實莫大焉！竊以為不如逕行改名為西疆，似為較符名實，（或問：該省天山南路舊稱南疆，北路稱北疆，今若改稱西疆，得毋有混淆嫌？關於此點，鄙意以為可改稱疆南或疆北，亦猶浙東、皖南、湘西、蘇北之成例，以地名為主，以區位為從也。至新疆原名，此後一律廢止不用。●綏遠省名，竊亦認為未妥，（徒以其地昔曾派駐「綏遠將軍」，故名，別無其他意義）蓋當此原子能之時代，南北二極，均為列强欲得而甘心之目標，翔寢浸乎將至與星球交通之遠景，今該省地處國境之內，為內陸省區，倘仍以「綏」應之以遠視之，何其局限一隅，將何以仰副國父建國之遠大規模？似亦亟須另易其他名稱。

王執中　卅五、十二；十、鄜縣

新疆譯名正誤

編者足下：最近在中華時報及申報內，見有譯自外記者華陀·屈萊克「新疆透視」之譯文，內容多有誤解及譯名可商榷處。國人素以外記者之報導為「了不起」之發見，實則彼輩對於我國情形，未必深切認識，同時亦足見國人對新疆之隔閡及前往該地人士之莫由深入。筆者所見，僅係數點，未免含文，僅就其大者，加以供改。中華時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一篇實上該省大部份的南部均出產於阿北的富庶區（伊犂、塔巴格臺及阿爾泰）」按塔巴格臺即係塔城，蒙名我素，譯為塔爾巴哈台，今譯塔巴格臺，令人莫解。又阿爾泰物產不豐，除產金外，其他地方出產之麥（不產稻），在豐年時僅足自給，伊塔二區尚可稱富庶，阿山則不然。同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迪化亦無法與哥薩克斯坦相競爭」，按此地原文所指乃係哈薩克斯坦，位接新疆，絕非歐陸之哥薩克斯坦。過去國人時誤以哈薩克為哥薩克，應注意分辨。同報十一月十七日刊「扶蘇油田」，應改為烏蘇油田，此油田在烏蘇縣南之獨山子。同報十一月十四日刊「叛軍約三萬左右，由回紇族，圖爾扎族……」按伊犂準語為圖爾力扎，係地名，非族名，譯為圖爾扎人或伊犂人則可，譯為圖爾扎族則不可。中報十一月十九日刊「……烏伊格人，寇爾吉盜人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佔蒲犂」，烏伊格人現通譯為維吾爾。寇爾吉蓋人新疆通譯為柯爾克斯，一般書內譯為基爾吉斯。我國譯非國語之地名，人名，素多紛歧，令人生疑，但於一般通用者現已趨一致，譯者應常注意。又蒲犂陷於三十四年八月廿一日，並非二十六日，現在國軍尚未將此地收復。謹註於此。

周東郊　三十五年十二月　蘭州

互助會

編者足下：近讀尊作「辛勤忍耐向前」一文，頗受感動。我現在腦中藏有一個意見，即中國好人向無組織。我想凡是中國好人，應組織一個互助會，自設監察，自設編纂，所有會員，當努共爭。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以此轉變風氣。先生其有意乎？

蔣錫昌　二月十五　無錫

蔣先生這個意思很好。但這祇是一個原則，可否再擬一點具體辦法出來？（編者）

抗幣與法幣的匯率

編者先生：你知不知道原來在抗幣與法幣之間也是有匯率的。二月十八日字林西報所刊延安廣播，謂去年十二月抗幣與法幣的匯率是抗幣一元，兌法幣一元三角，今年一月改為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五角，最近金潮以後，延安二月十七日廣播，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八角。我們一天到晚被「外匯外匯」弄得頭昏腦漲，原來除美匯英匯港匯外，還有一個「延匯」●眞是越弄越糊塗了。

惕生　二月十八日　上海

中國人的命運

編者先生：軍調部解散，中共雙方人物，紛紛設宴話別，葉文治還在私邸宴請葉劍英。據說他們都「私交很好」。我又想起蔣主席和毛先生在重慶舉杯相歡的那張照片。這幾個月來人確死了不少了，倒底為了什麼？你看吧，也許將來有一天那些巨頭又要握手言歡，舉杯互慶哩！有槍的永遠殺人，無槍的永遠被殺。這是中國人的命運。

文秀村　二月十八日　天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冊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一期
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本期作者

梁漱溟：
傅斯年(孟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莊智煥：全國工業協會理事
季羨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錢鍾書：前西南聯大教授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梁漱溟

我現在提出兩句話，貢獻給國人，特別是貢獻給國內各方面有心人士：

一、樹立自已信用；

二、力求彼此合作。

以下我說明所以提出這兩句話的大概意思。

一

我認爲中國今天正是舊社會崩潰解體，新社會建造未成之際。一切問題，一切病痛，罔不由此而來。而卅餘年間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則尤表著其苦悶之焦點。所謂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亦即指國家大局之總不得統一穩定而言。此一焦點，即全部問題之反映；而由此處不解決，其他問題其他病痛乃益相緣而無法解決。如此輾轉增上，牽纏一堆。——這是我的診斷，自民國十七八年到今天，沒有改變過。我從來不同意那一切歸咎帝國主義的流行說法。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面；問題主要是在中國社會本身，尤其在社會之崩潰解體。我從來亦不同意那「貧、愚、弱、私」一類說法（胡適之先生曾有五大魔之說亦此一類）。中國人的缺點，誰不看見；但問題之在社會組織結構間者，遠較其在各箇份子身上者嚴重多多。此外，從「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則封建勢力之殘存，亦被認爲問題所在。我承認有些舊東西舊勢力尚待滌除；然除之之法則在培養新東西新勢力。若無新者之起來替代它，它不會去掉底。所以這些總非主要問題所在。

今天在抗戰勝利後，中國國際地位已大爲改善，而中國問題初未因以鬆解。反之，中國人的災難今竟陷於無比之嚴重地步。這完全證明了我說問題主要在中國社會本身，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面底話。

我的認識既然如此，我的主張就一向集中在如何引此崩潰底舊社會，渡到新社會之建設途程上；而對於任何題目底暴力革命，或任何題目底對內作戰，均不承認，反對到底。十多年來，我不滿意國民黨，不滿意共產黨，就爲此。在新社會建設途程上，開頭一步必在國家權力粗得統一。這原是建設的必要前提。至於眞正統一之確立，必待建設乃得完成。這亦即是說：先求政治問題一初步解決；至於政治問題之完滿解決，那要隨着新社會建設之完成而完成底。這國家權力之粗得統一，當抗戰初起，我以爲大有希望。我同意毛澤東先生的見地：長期抗戰決定長期合作；抗戰中的合作決定抗戰後的合作。即我料想强敵壓境，必可促成國內團結，而使國家漸達於統一。我的堅强論據，就在中國人不團結不能驅除敵人，此無可置疑者；而我們之必定驅除敵人，亦屬堅信不疑之事；則在勝利之前

統一，不是確定了嗎？勝利前統一，勝利後還能分裂嗎？那擬得事實竟不然！勝利前就沒統一。勝 後之政治協商會的任務，是專爲謀國家統一底，看看可以成功；而偏偏到今天還是失敗！凡此均可見其逗合之機遠不逮崩離之勢；中國社會之大可憂者在此。

二

中國今日所苦，就在舊社會崩潰，新社會未成，前後左右不接氣；我們除一面仍要努力和平統一運動，固不待言，一面便應當從根本上作接氣工夫。此接氣工夫有二。——

其一，便是致力文化問題的研究，而謀不同文化之溝通。因爲使得中國舊社會崩潰底，並使得宅新社會不易構成底，全是在文化之雜亂不調上。非從這裏謀得其溝通協調之道，便無法使眼前那些頭腦不同觀念不同底人彼此接氣。又非從這裏研究，便無法看清楚前途要建設怎樣的新社會，及如何建設之途徑，而使前後社會早得接氣。最近我在大公報上「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曾略申其意，請參看。其實民國廿三年春，天津大公報初關星期論文時，我寫「中國此刻尚不到有憲法成功時候」一文，我早就點出下面一些話給國人：

從中國固有思想與西洋近代思想之矛盾衝突，又西洋近代思想與其最近思潮之矛盾衝突，使得今之中國人迷亂紛歧，無法可構成一種優勢底理性勢力，亦就無法產生一優越有力底意思要求，以壓倒其他，而爲製定憲法之本。

中國人眞成了人各一心，彼此心肝痛痒都到不了一處，意見理解很難相通。其形勢之分散，心理之乖舛，蓋古今所不可一遘。丁文江先生嘆息中國人沒有公共信仰。其實何敢談信仰，且問他，有沒有共同的問題公共的要求！

那時丁文江先生適有一文在大公報上，說要建立公共信仰底話。其意似與近中觀察週刊吳世昌先生「中國需要重建權威」之說相近。吳先生在他文內，有這樣話：

權威不是實力，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羣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根思想上底大柱子，頂住了這社會的組織機構。（見觀察此其用意，似與我有相近處；足見問題所在，大家亦都感覺到。但我却不說「建立信仰」，「建立權威」，其他亦有不同，後當再論，此不多及。

又其一，便是現在所提出底兩句話了。這兩句話，要分別講一講。

馬歇爾曾說，爲中國國內和局最大障礙者，即國共兩方彼此猜防太過，彼此不放心。這是事實。其實今天何止國共兩方彼此相信不及。在此廣大社會中，遍處皆是彼此不信任底空氣。政治上，由此而黨派合作不成，固然釀出當前莫大災難；其實這種含毒氣氛之流行，在社會之組成上便是根本底大危機。宅可以使社會不成社會，失去社會所以存在之道。但我們怪誰呢？本來遍處都是騙子呀！遍處是騙局，遍處是謊言，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尤以政治上爲最甚，尤以政府當局爲最甚。居高臨下，製造而揚播這種毒氛的，正是那些在上底人物！單是「壞事作盡」都不打緊，最可惡却是同時他「好話說盡」，使信義幾若非人間所有，根本破壞社會所以組成之道。

爲大局求轉機，近而各方面能和平合作，遠而圖新社會建設之有成，所以我以這「樹立自己信用第一」一句話貢獻於國人，並懷着萬分懇切心情祈求於國人。社會上增多一箇有信用底人，即增多一分元氣。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之進行即因之多一分積極可能。對於今天的中國，這就是極可貴之貢獻。假若是一箇黨派或一箇團體，或一箇負時望底人物，或一箇在社會有相當地位底人，那所關係者就更大。我們特別懇求他千萬自愛，一言一動，出處進退，保持其已有之信用，再增其更高之信用；而千萬不要不自愛惜，以致人們對他失望。那將不僅是他箇人之自毀，而實在給予此可憐之社會又一大打擊，一大破壞。他將不僅對不起他自己，他實更負罪於國家社會。我說這話，我直欲跪在他面前向他垂涕而道了。我大聲高唱一句：樹立自己信用第一！

本來人類社會所賴以組成者，如宗教、禮俗、法律、制度、一切成文或不成文底東西，大體都出於人爲底，都是後天底，亦即是文化底，然人類所有好誠實惡詐欺之一點，則是先天底。凡心眼實在，表裏如一，坦直慷爽，言必信，行必果這一類人到處都歡迎底。蓋人與人心氣相接通，彼此能共事者在此。所以在我們此時，縱然文化雜亂無章，未臻協調，雖有

標準，而人人有信用，則猶有其可憑之點在，亦足以相維繫。

更且是從這裏亦不難產生新文化。今天我們新文化之難於產出，非在受到什麽阻抗。恰相反，就苦在遇不着阻抗。你說「民主」，他亦說「民主」，人人都在說「民主」。你說「自由」，他亦說「自由」，人人都在說「自由」。弄得「民主」「自由」遍於天下，充耳塞目，不勝其煩，而民主自由乃愈不可得。你如果從名詞上口號上求之，則各樣不同文化在中國早已達於協調了，用不着再去創造。然而事實何在呢！所以只有羣以無信用爲賤，相約不理睬他，使他不能存在；一切澄清下來，然後中國才有辦法。

三

樹立自己信用第一，力求彼此合作是第二。人們彼此間有信用，遇事自能合作；然爲挽救大局，開展前途，更須加意求之。

國共兩大黨今天相殺相斫，不惜毀滅國家，是彼此不能合作之最大者。然而他們本是相爭之兩造，宿怨積仇，非有第三方面督迫之，豈易合作。在他們以外，廣大之第三方面不能合作起來，成爲一大力量，以轉移形勢，奠安大局，才是眞該受責備者。而況且在第三方面原有聯合底；不唯不能擴大充實這一聯合，乃其後竟又合不攏，而一箇一箇裂出去。這才眞是不能合作之最大者！陷大局於今天不可收拾地步者，實乃在此。在大局政治而外，其餘不論大事小事，如我們所見，都爲其間彼此不能合作，許多聰明，許多力氣相抵相消，而牽陷於僵局，寖尋於毀敗。隨處都是例證，不煩枚舉。則力求合作，豈非救時之藥。

再則展望新社會，我相信前途，在政治上決不是各黨各派各自活動，合法競爭，如英美方式，而是彼此合作；在經濟上亦決不是企業家互不相謀，自由主義之時代，而是生產者消費者都彼此合作。說世界潮流今後要日進於民主，亦正因今後一切的一切是要彼此合作之故。則力求合作，恰是進行新建設了。

因此，一切有心人應當在有形無形之間，隨時隨地，倡導合作運動，培植合作基礎，散播合作種子，消除人與人間的險阻隔閡，使此渙散而且僵痺底社會融合復活起來。然而要同人合作，却亦不是一容易事。我素常講人與人合作的基礎條件有二：

一、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

二、在識見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時下風氣刻薄，專好以不肖之心推度旁人。談論之間，總是說人壞話，不說人好話。一般人相與之間，除表面有些虛情客套外，其內心絕少對人存恭敬信服之意。自共產黨理論之輸入，動輒以「統治階級」「買辦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指目於人，非懷敵意即存鄙視。而人亦以洪水猛獸視共產黨，隔閡誤會至不可解。這樣就失去彼此合作的基礎，直是讓社會走上絕路。我們必須先把自己放得坦白空洞，虛心以求瞭解一切。而在與人合作之初，尤須拿出信心與熱情來。偶有誤會隔閡，總力圖打開，重新求取瞭解。如此路子愈走愈活，才可開出光明底前途。人情大抵不相遠，而彼此感應之間，至神至速。順轉逆轉，出入甚大。關鍵在我，不必責之於人。

對於一件事情，而兩箇人所見不同，主張各異，除了各有其立場和用意外，便是彼此的識見問題了。構成一個人之識見底，一則在他的頭腦聰明，二則在他的學識經驗，三則在他對此一事之見聞所得。這些地方、無論賢愚錄錄不肯讓人。誰都覺得自己聰明，誰都自以爲是而不肯服人。彼此不能合作，亦多由於此。其實聰明關乎箇性，經驗限於一隅。與其各執一偏，不如善觀其通。任何不對底見解，亦都是眞理的一面影子。彼此所見不一致，未嘗不可相資爲用，正不必抹殺人家。平素我總感自家學識不足，臨事日恐思慮有所未周，或者他所知道底有在我所知之外者，願更資取於他，成就自己。往往這樣，倒引起對方亦來接受我的意見。由相遠而相近，由不合而漸合；合作基礎遂以建立。

舉箇例來說，我與共產黨之間顯然有很大距離。在理論主張上，他有他們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這距離不同尋常，不易泯沒。然而根本上還是相通底。我有心肝，他們亦有心肝。我對於民族前途，對於整箇人類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遠大理想；除掉這遠大理想，便沒有我。而他們恰是一箇以遠大理想爲性命底集團。說到眼前一樁一樁事，尤其容易說得通。這樣，遇着該當合作底事，就可以合作。語其合作之所以可能，要不外有合於上面兩條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底，我敬愛這些漢子。至於見解主張之不同，不妨「寬以居之」，一切從頭商量。異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在事實所必要上，讓一步又何妨。歸總一句話：把人當人待，那裏有說不通底話。自外於人，偏說人拒我，那就不行了。去年三月我第二度到延安，在他們歡迎會上，我就曾這樣坦白自陳，並提出這合作的兩基礎條件來，供他們參考。今又特提出請教於各方朋友，並請教於國人。我以爲只有這樣把東西南北各式各樣底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國才有救。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傅孟真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滋泥」，這句俗話正是今天中國的現狀。「滋泥」是勞苦大衆，蝦米是公教人員，小魚是小生意人，大魚便是大資本家。

但，大魚也分好多類，有三尺長的大魚，不堪鯊魚一擊，有鯊魚，不堪長鯨一擊。今天長鯨有兩個，皆憑借政治成就；在生長中的還有幾個，要看後來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鯨魚腹中之勢。

「官僚資本」一個名詞是抗戰時候的產物，還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當時的中心對象是孔祥熙，現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決不當忘了孔祥熙。現在我解釋這名詞一下。

現在必須分辨三件東西：第一，國家資本；國家資本的發達是走上計劃經濟、民生主義、溫性的社會主義必由之路，所以如果辦得好，我是百分的贊成。這些年國家資本相當發達，但內容和表面大不相同。從表面說，鐵路除中長爲俄有外，幾全是國有（除去宋家與洋人要修的成渝鐵路等）；航業則招商局，壓倒一切民航；航空號稱民營，實是國家資本；主要的銀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汚。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爲限），豪門把持着，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着，荒唐着，僵凍着，腐敗着。惡勢力支配，豪門把持，便更滋養惡勢力，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英國現在工黨所行的社會主義政綱，好多我們已經實行了，例如鐵路、銀行、主要工業之國有，我們都作了，然而結果不特愈弄得去社會主義愈遠，而且去任何有效政體、像樣社也會愈遠，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國家資本之基礎觀念上。

第二，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在中國眞發達極了，上自權門，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經營的公務員，爲數實在不少，這幾乎包括中國的資本階級及上等布爾喬亞。西洋的布爾喬亞總是投資在股票或債券上，中國工業不發達，已有者又破產，誰玩股票？債券是靠國家信用的，今天還說得上嗎？中國過去官僚總是投資在田地，今天田地是個大累贅，誰肯？於是乎小官僚資本託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託庇於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於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第三，權門資本。權門資本本是官僚資本之一類，然而其大無比，便應該分別看了。這些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於他的官僚資本。爲所欲爲，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爲了解所謂 Sound Business 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搶斃了的），家奴……其數能與注重工業遠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過之。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並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爲之處。但「世家」二字，我曾打聽他的故人，如嚴莊監察使，那就眞可發一笑了。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已，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裏，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却有事實證明。利則歸已，害則歸國者，例如某某幾個私家銀行，在戰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維持，兩三年前他准許這幾家銀行退還官股，以當時一元當戰前一元——所有這些銀行在收到官股後所獲的利益都不算了，這簡直是拿國家的利益直接的、毫無掩蓋的送人；其實並不是送人，而是送已，因爲其中某某幾個銀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機不密，爲若干參政員所知，於是參政會大鬨幾陣，「此說作

罷」，但眞正罷了未罷，以後誰來查過至於？扒手之說，決不寃他，即如中央銀行國庫局案，人證物證齊全，雖說政治上使其擱着，因爲已經「退還」（試問小偷强盜退還贓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並未完結，因爲原告並未撤消。所以他如以我爲侮辱，必須告我於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言歸正傳，我們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這與經濟無關之人。辦這樣事，那有不嚴密的呢，然而八年參政會已經鬧出那些事實來，鐵幕也有漏縫之處，然而漏縫之處究竟所窺有限了。其實人既活着，即不留心，也不能無所見，請看揚子公司，進口那樣好，他結外匯何以那麼容易呢？資產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錢嗎？若說「久宦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槍斃的故海軍上校劉乃沂答辨的理由），我看，這些年來久宦，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滿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辦法。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有時彷彿像是有政策的，戰前也曾吸收過若干社會上認爲可以有爲之人。上海的「高等華人」戰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爲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國民黨整天談「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國營」，……宋子文做了國民黨的沙蘇特，儘管他相信他的 Sound business，也應該稍許有個樣兒，然而完全與這些口號相反的。

不談國有國營則已，要談則第一件要國有國營的便是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ies），偏偏我們要「宋營」。現在全國電氣事業，除冀北由資源委員會接收外，其餘均非國營，而且走上了集中壟斷的路。如戚墅堰電廠（壟斷京滬之間），首都電廠，以及武漢之既濟水電公司等，均爲建設銀公司所有之揚子電氣公司經營。人人皆知建設銀公司姓甚麼。

煤礦在原則上亦應由國家經營，因爲他是動力的來源。中國煤礦除勝利後在東北及熱河接收者外，皆非國營，北方的多爲北洋軍閥官僚所營，本是國民黨北伐時打倒的呼聲之一。現在揚子江東區之唯一大煤礦，即淮南煤礦，也是建設銀公司所營。最近江西之鄱樂煤礦，又爲建銀所買到。四川某煤礦，又以另法支配。現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經定了，北洋軍閥多已破落倒出去，而誰買，是可想的。

說到這些事，煤礦，電廠，本由張靜江先生之建設委員會而來，當時是國營，因爲建設委員會是等於政府一部的。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於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說到建銀，由一個美國人來華造計，原爲吸收外資的，尤其是美資的，美資並未吸收着，定了一個不利的成渝鐵路借款。本來是官股，許私人入股。現在我不知道還有幾分官？古人說「化家爲國」，現在是「化國爲家」。以上的這些，政府若對得起人民，該去淸算的。

難道宋子文不談國營嗎？他是談的，現在有他的資源委員會。辦資委會的人，確也認眞辦事，絕不能說貪污，然而賺錢的事業既已「另有辦法」，看看他的事業單子罷！東北工業，在那樣情勢中！撫順毀壞，北票不安。銅，鐵，電氣材料，機器，無一不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所以這些國營，還是「國賠」而已。資源委員會也得設法自食其力，於是經營到台灣糖（專利），自行車，肥皂，蠟燭，……資源二字定義如此！

宋也「爲國家」營了一件「賺錢」的事，就是中紡公司。那些反對他這事的，本也多是要自接收（「抗戰工業或非工業家」）又請流動金的，並不可取，然而他營的成績如何？號稱去年一月一百億歸政府，今年一月三百億，算是賺錢了罷？然而想想，一百五十萬紗錠，全無代價，一切生財，是接收的，美棉用官價結，數目那樣大，消耗外匯那樣多，如是報效政府僅僅此數，眞是得不償失，這叫賺錢嗎？說是平抑紗價嗎？又不然，紗布價在生活必需品指數上爲先鋒。他又說了，中紡只佔百分四十，商家漲了，他無法控制，這眞左右前後均不能自完其說了。年底分紅那麼大，是有益於國？假如當年把這一百五十萬錠賣了，不白送人，法幣回籠，要比黃金政策多得多，紗價還不是一樣高，反正他自己說他不能控制。還有一妙，因爲「人民」爲此事吵死，他又說，將來發股票賣給人。假如分開賣，有人買的。現在合成一個托辣斯，他捷足先登控制着，誰來買他，買就是捐款給他，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談麼？

這樣說下去，多着呢，今天止於此。現在說結論。

豪門資本這樣發達，中國幾無國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這樣子，太慘了（雖說是日軍閥作禍首，然財閥如不發達，軍閥無能爲力）。

他們還是幾代（從江戶時）辛苦建立的，不像我們的這樣「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歡迎孔宋當國者，只有一派人，即共產黨和他的尾巴，因爲二氏最可使中國紊亂的。我們不顧我們的國家成五胡十六國，成外蒙古，我們實在不能歡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眞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垮，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並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他的自由買賣，澈底失敗了。頂好的說，你總不能用甲思想作反甲思想的事，何況他的思想是由於他的 vested interest ？

這還不能算完。今天我們要覺得晉惠帝不愚，因爲他聽到公園裏蛤蟆聲，他問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們必須清算十年的事物，那些是公而私的，那些是私而公的。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產，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我在參政會如此說過。有些報紙說我說，二家財產够國人過一年美國人生活水準，那是他們說的，說過與不及一樣壞。）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到民國五十一年還他們本息，他們要的是黃金美鈔，到那時都可以的。你們曉國家十五年，給一個喘息的機會罷。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有朋友問我，你說孔宋不好，張家璈何如？我說，何止張家璈，連那些「自由計劃經濟家」，無知低能的「民生主義哲學家」，等等都是愈弄愈糟的！我對於過去的萬忍不住，對於將來，我並是「政治經濟病菌學」專家。

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編者按：已見本刊本期「觀察文摘」一欄）

教師與進步

錢端升

現在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我們的又是一個混亂沒進步的國家。我們要是老這末沒進步沒出息，世界的繼續動盪固然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沉淪到萬劫不復，即使世界安定起來，我們還是走頭無路。那時，我們好比一個村塾頑童，人人將成了我們的嚴師；好比一個市井無賴，衆鄰均所不齒。所以進步——而且是最大可能的最速可能的進步——是我們最急切最重要的要求。在有秩序的世界中，進步的中國可以很快的達到富强康樂；即使世界繼續紛亂，這個中國至少還可以飄浮而不至於沉淪。

然而，在現實的情況之下，進步豈是一件容易工作？我們本來就是窮，戰爭使得我們更窮。我們本來就沒有建立過法治，黨治人治使得我們離法治更遠。我們本來就很少自由的科學的思想，愚妄的（不基於知識的）和自私的（不爲大衆利益着想的）宣傳使我們更不認識自由和科學的精神。加以近年來蔓延不已的內戰，和因此內戰而引起的多方面的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利害衝突，更使我們貧窮，混亂，落伍。在這種種不利的情況下要求進步，其實現必然千難而萬難。不但實現進步是難事，連什麼是進步也好像成了問題似的。不但把握實際權力的人所說的進步不見得是眞正的進步，即使爲外國人所譽爲進步份子所說的進步也不見得是眞正的進步。

正因爲實現進步的不容易，所以有一羣有資格的人來說明進步，提倡進步，乃更有其重要。必定要大衆認識什麼是進步，人們才會要求進步，而他們所要求的也才可不爲他種東西所魚目混珠。

進步不能單單是抽象的觀念，也不是幾件具體的改善之謂。假如說，近代前進思潮傾向自由主義，民生主義，共產主義，我們並不能因嚷嚷「自由主義」，「民生主義」，「共產主義」即算進步。再假如說，報紙發行普遍爲近代進步的一種表現，我們也不能增加了幾十種幾百種報紙，即可自以爲有了進步。進步須是一種整個的看法，具體的表現須和抽象的理想符合，而所謂具體的表現者又須是一切表現的總和。

須能超過少數人或是一部分人一時一地的利益，須能顧到大衆（就中

國言則為中國大衆人民）長期的利益，更須能顧到這一羣大衆在所處時代中的殘存能力而思有以保存之並增強之，才能抓到進步的意義。不能認識時代，明瞭整個人類前進的過程與夫中國人民在這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不能談進步。不能對大衆人民發生同情心，發生一種救苦救難的慈悲心，也不能談進步。空空洞洞嚮往進步，而對於阻礙進步的人們或噤若寒蟬不敢置一辭，或陽反陰附為虎作倀，更不能談進步。

再說得切實一點，進步者無論對於文化，對於種族，對於經濟制度，對於政治關係，或者對於文藝生活，均得有一種前進看法，而這看法的基本要點即是承認人的尊嚴，生的重要，以及人類的整個性和進步性。

承認了人的尊嚴，則人間的平等，民族間的平等必須認為是天經地義。個人的自由必須尊重。人必定認為是理性的動物。因之，一切否認平等自由的思想制度均是改革的對象。不如此便不是進步。

承認了生存的重要，則一切妨害生存，限制生存，給生存帶來了痛苦的因素均在掃除之列。小而言之，迷信是要不得的。大而言之，戰爭是要不得的。因為迷信與戰爭都是生存的敵人。從方法言，科學技術是需要的，從實施言，社會主義的經濟也是需要的，因為兩者都可以增加生產，增加人的享受。

承認了人類的整個性和進步性，則宗教集團間的傾軋，階級間的鬥爭，民族間的對峙，以及某一羣人或某一民族的優越感都成了反進步的表現，必須予以擯斥。

再舉幾個例：擁護統治階級，而不問統治階級的行為是否合乎被統治大衆的利益，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為這就是否認了人的平等，人的尊嚴。贊成內戰而不問內戰之如何消耗民命民力，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為這就是蔑視了人的生存權利。提倡國粹，而不問國粹之如何不能通行不能適時，也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為這就是抹殺了人類的整個性及進步性。

那種人應該有資格來說明進步，提倡進步呢。政客們以政治為生活，應該知道中國之急須需進步。然而中國近百年來，沒有一個時期的政治會經和時代配合過。道咸時代的政治和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與生產制度不配合，袁世凱時代的政治和首次大戰的政治經濟主義不配合，今日的政治和原子能與社會主義更不配合。加以政客們在高度的個人集權主義之下早已成了少言語更少思想的機體。希望他們從不進步中掙扎出來顯然不易。生產家怎樣？從事生產業者，無論農夫、工人、企業家，歷年來都是遭逢着極端不利的境遇，他們不特不能改良生活或是擴充事業，就連溫飽的維持都成了問題。但農人工人大都未受教育，且習於定數之論，絕少自求超脫意念。企業家則為既得利益所囿，投鼠忌器，更難有所發揮。祇有教師們，知識高於農工，時代的趨勢以及中國所遭遇的危機也該明瞭，又沒擁有像企業家們所擁有的既得利益，說說話應該可以沒有危險。這樣說來，教師們應該有資格來說明進步並提倡進步了。

然而教師們畢竟能不能呢？第一要問，他們的傳統是否依舊是過去士大夫的傳統？他們是否也擁有着士大夫們自以為擁有着的既得利益？對於中國過去士大夫階級作公平的評價本不十分容易。可得而言者，士大夫階級所曾滋長的社會一貫的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社會。這少數人或許是閥閱世家，或許是將帥大吏，或許是皇族國戚；在某一個時代的，這少數人定必是現時所謂統治階級。士大夫階級最奢的慾望是和某一時代的統治階級打成一片，最起碼的企圖則求為這統治階級所垂青，所引用。因此，士大夫階級縱可以轉移社會的習尚風氣，而絕少有左右社會的力量。中國歷史上最標準的，最為士大夫所稱道而師法的人物，如董仲舒，如魏徵，如范仲淹，如王守仁，如曾國藩，那一個不是立德，立言，立功的士大夫？然而他們究有多少左右社會，促使社會進步的力量？他們畢生充滿了依附一種現成力量的意味。他們都是衛道者，他們很少能超越他們的階層利益，而為廣大人民的利益設想。為廣大的民衆設想便須變制，而變制即不是衛道。我們如果將士大夫領袖曾國藩和沒有士大夫階級的英國格拉斯東（和曾同時）比較，而研究何以好像開明的曾大學士對于法制經濟那麼沒有建樹，何以生性保守的英首相對於選權、宗教、財政等事倒有大作為大變動，我們或者可以窺見進步和士大夫傳統之兩不相容罷！

今日的教師們又怎樣呢？無庸諱言，他們是分的歧。一部分，無論是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牢守了過去士大夫的傳統，絕對不想跳出那傳統。又一部分則接受了近代的社會思想，放棄了依附新治勢力的傳統心理，決心為全社會的利益努力。另有一部分人則徬徨歧路，不知如何自處。人人有惰性，比較簡單的自處方法似乎應照傳統而行。但人人也有理性。

比較滿足良心的自處方法又似乎應作一番檢討，一番自新。他們於是徬徨無定，甚而至於煩悶。在今日的教師們中，第一第二部分人或許俱是少數。第一部分人或者只限於少數『成功』或自以爲『成功』的人們。因爲『成功』了，所以也有了『既得利益』的觀念。第二部分人則只限于少數最明白最熱心最富於同情（同情大衆福利）的人們。徬徨歧路者或許佔了多數。教師們能各成爲進步的力量，就要看這一個多數能否毅然脫離了士大夫的傳統，把他們自己看做了一切社會利益的釀造者，而不是統治羣的支持者，點綴者，最後乃是參與者。

有若干因素說明這一羣衆多的教師，是不易終止徬徨而負起倡導進步的大任的。但也有若干因素則在指示着，他們必可負起這個大任的。士大夫傳統力量的深固，以及若干人繼續不斷地讚美這傳統，可以使教師們不能從憬憧中覺醒。還有，政治鬥爭的尖銳化，不朱則朱必詆爲墨，不墨則墨必詆爲朱；朱容許是極糟，墨亦未必是百分之百的進步，這種夾攻也可使本性溫和的教師們趦趄不前。這兩者都是不利的因素。

但在另一方面，中國長期的不進步，近今高度的混亂，與夫人心極度的厭亂，都在急切地要求進步，要求不流血或極少流血的進步。絕大部分教師們因自己的窮困，和他們從戰爭中體驗出來的人民普遍窮困，以及他們的學生們之逐漸變更階級意識，學生們之增加以大衆人民之發言人自覺：這些也在逼迫教師們和士大夫的傳統訣別。還有，世界在大變動中。十年以前世界是法西斯主義強抓住了全世界人民的喉頭，全世界人民幾乎要窒息死去。但是曾幾何時，納粹之德和法西斯之義兩俱滅亡。在一百年以前的世界中，大多數人民不是奴隸，便是被宰割着被統治着。最前進的政治經濟只是目下英美人所一致認爲落伍的貴族政治和放任經濟。到如今，則大衆的知識，生活的水準，和人的自尊心已有了百年前所不可思議的提高。這樣的變遷所發生的力量，必不能容許我們故步自封。我們順着潮流走，則進步快而心境愉快。我們逆着潮流走，或是擋着潮流不走，進步也終會降臨；不過，進步就要遲慢，犧牲就要重大，而身處其境者亦必十分痛苦。這三者都是有利的因素。

我們當然十二分希望這大多數的教師能終止他們的徬徨，能爲中國人民的推而至於爲全人類的進步而努力。如果他們不拿起進步的旗幟，目前國內將更無另一羣人能負起這重担。這樣，如上面所說，進步不但將延遲，而且必爲世界所逼迫出來的結果，也必將從大流血大犧牲中得來。多少年代之後，頭腦冷靜的史家們一定要詛咒我們這一代教師們之沒有出息！

反過來，如果教師這一羣人能提倡進步，歌頌進步，代表進步，進步的力量一定可以很快地壓倒不進步假進步和反進步的力量。儘管教師們仍是以教師爲職業，不參加實際的政治服務或是社會服務，反的力量試問將有何法以維持其自信力？將有何法以取得理論上的支持？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簡貫三

一 金潮的過程

這次的金融風潮，是由黃金美鈔的暴漲引起來的。據報端所載，京滬一帶，一月三十一日，黃金每兩售價四十三萬二千元，美鈔每元七千五百元，自二月一日起，黃金上漲爲四十四萬五千元，美鈔爲七千七百元。這個漲勢，一直扶搖直上，至二月十一日，達到了最高峯，即黃金八十六萬元，美鈔一萬六千五百元。甚至于有黃金漲到九十六萬，美鈔漲到一萬八千元之傳說。從十二日起，這個漲勢，忽然退潮，黃金下落爲七十萬元，美鈔爲一萬一千五百元。十三日雖又有回漲，但退潮之勢已成，實難有再鼓餘勇的魂力。所以從十五日起，金鈔價格呈現暫時靜止的動態。

二 金潮的影響

風潮的時間，不過是十二天，而其影響，確是我國勝利以後從最嚴重的事件。這些嚴重的影響，首先是一般人民生活的降低。因爲黃金漲了一倍，美鈔漲了一倍半，其他物價，急流勇進，不甘落後，竟漲了兩倍三倍之多。有些富裕人家，利用投機掠取的慣技，在十二天之內，賺了黃金壘壘，美鈔滿袋，而我們中層以下的人們，一覺醒來，十萬元法幣忽然不翼而飛，貶成了七萬，再過了十天八天，生活水準又降低了一倍還多。上海大公報所載十五日廣州專電，「中山大學五千員生亦受此次金融浪潮之震撼，該校所在地碑石，各米店曾一度停售，飯店客飯價錢，十一日一天之內，由一千一百元漲到二千四百元，遂致一部份學生改食紅薯。」以此類推，公教軍警人員每月有三十萬元薪水的，經過十三天的變化，忽然降低爲十二三萬元，最多只有十五萬元。此外，各城市中產以下的人家，莫不受金潮之連累，把生活水準很迅速的降低下去。現在金價雖回落四十八萬元一兩，但一般物價還未照此比率完全下降，所以它對于一般人民生活的嚴重影響，依然繼續存在，並不因政府公佈的經濟緊急方案以後，而能將生活水準恢復到一月三十一日的標準。

這是此次金潮的基本影響。由于基本的影響，引起了各方面的焦急惶惑。蔣主席于十一日聽到黃金漲到八十六萬元一兩的報告以後，赫然震怒，下令嚴辦。宋院長貝總裁迭次由滬來京請示，不敢再自行決斷。中央常會臨時組織經濟政策委員會，便由此而來。宋院長素以自任自負聞于世，尤其是對于金融經濟問題，更自以爲勝算在握，而今竟在經濟政策委員會中與各委員連日研討應付方案，亦可見金潮來勢之凶惡以及經濟情勢之危岌。立法院于十四日舉行大會時，各委員爲着金潮泛濫，妨礙國計民生，一致要求宋院長列席下次院會，以便質詢，宋氏允于兩週內來立法院與從未見面的委員們會晤一堂。

金潮震動了首都，並改變了宋院長對人對事的態度，這是金潮對于政治方面的影響。

當金潮發展到 Climax 的時候，聯合社華盛頓十一日電：「國務院發言人宣稱，中國法幣價值跌落，經濟危機日深，美政府日益關切……據非正式表示，今日之事，乃中國自身問題，應由中國負責應付。已往中國迭次告急之時，外間即謠傳美國擬採取緊急辦法，協助解救，但官方並未予以證實。此間又傳南京政府擬將中國私人在美存款，收歸國有，但亦無法證實。」以我的淺見觀察之，這個電訊，包含三個意義：一，表示外交式的一種關切態度。二，表示不要存求救的希望。具體言之，即暫時談不到什麼貸款問題。三，暗示中國私人在美存款，中國政府或可動用，以資自助。此訊發表，過了五天，國防會議于十六日通過一個要案：由政府定期照法定匯率收買國人在國外之存款。以前後的線索尋繹之，金潮激動了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暗示了中國政府，于是才有收買國外存款之動機與決議。這是金潮影響國外，又由國外影響國內的地方。

三 金潮的因素

此次金潮，其來也暴風驟雨，其去也如江河日下，似乎令人有飄忽之感。但一究其來龍去脈，實在有其相當的遠因與近因。

第一，從政治方面說。此次金潮的背後，潛伏着嚴重的政治問題。如行政機構的層床架屋，互相牽制推諉，誰也不肯負責，誰也負不了責，流弊所及，所謂萬能的政府，變爲無能力的政府。如此機構，如此效率，投機掠取的份子，自然伺隙而動，再接再厲。又抗戰時期，政府對于這般人始終未予以有效的制裁，慈不長法，相習成風，此次金潮，不過是九年以來連台表演的一幕。只因爲演的人過於起勁，看的人認爲過火，才引起朝野的誹議。

第二，從政策方面說。本來金融政策應該是配合財政政策的，財政政策應該是配合經濟政策的。倫敦 Times 報常以「金融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奴隸，財政政策是經濟政策的奴隸，」砥勉行政當局，以指示國計民生之關係。然而我國的行政當局竟以金融政策領導一切，以營利主義爲最大目標，于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這般投機掠取份子自然無所顧忌，越幹越胆大了。所以這次的金融狂潮，骨子裏隱伏着政策上的本末倒置問題。

第三，從法幣的膨脹方面說。法幣的膨脹與流通速度的增加，勢必使物價由算術級數跳到幾何級數。在七七抗戰之時，法幣發行額計十四億七百萬元，至三十四年底。膨脹到七百三十五倍——即在八年中，平均每年

膨脹九十二倍。至三十五年底，大概膨脹到三千三百五十倍——即在去年一年之內膨脹了二千五百一十五倍，比過去八年中的每一個年頭，平均多二十七倍。這是一個大概的估計，究竟是否正確，我不敢確定。茲再退一步想，假定法幣的發行額爲三千倍，法幣的流通速率爲四倍或五倍，則法幣的貶值程度與物價的上漲倍數，恰好如現在一萬二千倍以上的數目。但是今後法幣的發行率，若不加以控制或緊縮，那幾何似的物價上漲，必定越翻越大，越大越快，終有超過法幣脫離法幣之一日。

這種道理，一般人雖習焉而不察，但是看到鈔票的金額越印越大，物價越過越漲，當然感覺到法幣幣值日日在低落之中。客觀的事實是如此，主觀的心理也是如此，這就是大家爭購黃金美鈔的有力因素。所以在法幣未加以整理以前，似難禁止黃金美鈔的上漲，尤難根絕黃金美鈔的黑市。不過禁止買賣以後，希望與物價漸漸脫離關係，以免常常波及一般人民的生活而已。

第四，從少數富豪買辦操縱牟利的方面說。一般公教人員、文化工作人員、小商人、以及勞工農民，平日生活，均感十分困難，那還有餘資購置黃金美鈔呢？就令少數人以節儉之錢，買到星星點點的黃金，也不至於操縱市場。可見這次大批買進而能够操縱市場的人，都是富商買辦之流。

第五，從外匯調整的謠傳方面說。舊曆年前，即有外匯提高的謠言，後來金融當局一再宣佈否認，而商人的敏感性，並未受到多大影響。二月六日進口附加百分之五十，每美元合法幣五〇二五元，出口補貼百分之百，每美元合法幣六七〇〇元，而其他外匯官價，仍爲三三五〇元，是以對美外匯，形成了三種匯率。因爲匯率的歧異，以及進出口匯率的增加，所以投機者，操縱者認爲興風作浪的機會又來了。

第六，從一部分工業貸款的方面說。開舊曆年關，國家銀行貸給工業界三百億元。因此，五千元一萬元一張法幣，流通市面。據南京大剛報二月十日上海電，「上海鎭江等地，有一部分廠商，利用舊曆年前借來的大量法幣，購買黃金美鈔。」以後政府對工貸政策應有妥善的考慮，並在方法上要有徹底的改善。

第七，從舊曆年關過去的銀根方面說。舊曆年關爲工商業的大關。關前的半個月，銀根必然緊迫。關後的半個月，許多商業多未正式交易，頭寸必然充足，所以于舊曆正月十一日（即陽曆二月一日）起，即開始掀動金鈔的風潮。

四　金潮的應付

由上面七個因素看起來，足見此次金潮之發生，並不是偶然的。旣非偶然，而竟釀成狂潮，殊覺事前有失于防範之處。當風潮正在擴大之時，行政與金融當局，亦覺未盡最善之努力。試舉一例。當局若自以爲黃金政策仍有維持之必要，即應令中央銀行盡量拋售，否則，不如早日宣佈停售，以免遭最後之失敗。不意二者均未採行，而在時拋時停之中，徒增加投機者的勇氣，使其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從政策與實力方面說明當時應付的失着。再從精神與輿論方面，亦可推測有未善于運用的地方。當金鈔正加速上漲的十二天之中，宋院長貝總裁始終一言未發。如此沉默，固然可以表示沉着應戰，使人莫測高深。但是這種態度，只能適用于盡量拋售之時，而不適用於拋拋停停之時。有力用力應付，無力不得不以言語求大家精神上的安定。即令不可以言語表示，亦應運用輿論，評擊投機冒險以發揮社會制裁的效力。這兩項又未做到，無怪乎金潮幾成橫決之勢。

至于民間方面對于金潮的應付，亦顯然冷漠無方。在民主國家，像這樣的巨變，使一般人的生活驟然惡化，必定惹起輿論的指摘與民衆的制裁。可惜我們的輿論，連好說話的大公報竟無一篇社評評論此事，我們的文化界，我們的民意機關，民衆團體對于此次震動中外的金潮竟沒有嚴正的表示，以發揮社會制裁的潛力，無怪乎馬歇爾的臨別贈言，認爲「中國民主進步份子未能形成社會中的集體力量，實係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大缺憾。」（述其大意）

說到這裏，我想叙述一個小小的穿插。即當十一日晚間，我和立法院樓委員長桐孫，劉委員不同，李委員慶麐等談及金潮之嚴重，認爲應建議當局，實行黃金外幣國有，或停止黃金買賣，以期挽救狂瀾。當時南京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先生在座，遂將此訊刊載十二日中央日報重要地位，接着滬上各報及國外通訊社紛紛轉載，于是滬上投機商人忽然有徬徨之感。十二日以後，金鈔價格，由八十六萬落到七十萬，這個消息，似乎有點影響。現在黃金國有之議，一時或許不能成爲事實，但此議在金潮漲時所起

的反作用，確是不能抹煞的。

五　金潮的善後

金潮的善後問題很多，玆依據法理舉其要者言之。首先我們應該認明投機者購進大批金鈔，以牟暴利，以社會道德觀點衡量，他們的動機與目標，那眞是過于自私自利，足以惹起世人的公憤，可是按「法理」來說：中央銀行既然公開拋售黃金，而且也沒有規定最高的限額，即令一個人用自己的錢財一下子買了十噸廿噸，那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否則，若政府于事前制定了法律或公佈了命令，規定購買黃金的限額，而購買者偏要超過限額，那就算違法或違抗命令了。基于此義，在黃金政策之下，人民無論購買多寡，不能冒昧加之以罪。

若說購進大批黃金，足以擾亂市場，應依照廿六年國民政府公佈的「非常時期農鑛工商管理條例」，予以處罰，但是這個條例，在抗戰勝利以後，是否宣佈過繼續有效？若以爲既未宣佈無效，當然時效未失，但是以陷淪區域之廣，戰時法令，人民無從盡知，似應于勝利之時，宣佈繼續有效，方覺完備。英美本土尚未淪陷一塊，曾經于戰事結束之後，宣佈過某種戰時法令有效，某種戰時法令無效，使人民知所適從。爲着推行法治，此種手續是不可少的。

假定說購進大批黃金，有投機壟斷，擾亂社會秩序之嫌，似應由法院檢察官偵察後，代表國家提出公訴，亦不該由軍事人員出面辦理（除與軍人有關者外）。

報載：金潮將完未完之時，國防部派員到滬，辦理此案。我的淺見以爲若果軍人中有利用公款購買黃金的嫌疑，國防部可以依軍法處理的，並可以調閱與此有關係的商號賬目的。如若軍人中以自已之錢購買黃金，無論購買多寡，那是不違法的，因爲政府並沒有不准軍人購買黃金的法令。

以此類推，中央銀行職員以及其他公務員，是否在金潮中有違法失職之處，監察院有權調査彈核的。民營銀行是否違反了「銀行不得購買黃金或以黃金作抵押之命令」，財政部有權派員査賬的。工業貸款的廠商是否有移用工貸購買金鈔的事實，經濟部是可以派員査賬的。

至于美鈔的買賣，久已成爲公開的秘密，政府向來既未以法令制止，那末這一次的美鈔狂潮，對于買賣的人們，似亦不應予以處罰。一個獨立的國家，本不應容許外幣在本國流通，但是政府既未禁止于前，則人民的買賣行爲，似乎無法律責任之可言。

總之，金潮的洪流，已激起英美人的注意，中國的新憲法，已于本年元旦公佈，所以政府處理此案的手續，還是根據事實與法理，方足以得到中外人士的信服。

我個人的心目中，對于這些投機牟利的大亨，當然認爲是人民的吸血鬼。可是心中的憤慨是一回事，法理的尊嚴又是一回事——絕不可以心理上的衝動，埋沒了法理的尊嚴。

還有一層，以上所述，是就法治的觀點作出發點的，若採取革命的觀點，那又是一種說法了。一個是維護法治問題，一個是政治革命問題。爲着一個臨時的金鈔風潮，似乎用法治的力量，可以辦理善後的。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莊智煥

一　金潮的成因

這次金潮的泛濫，與其說是少數人投機操縱的結果，無甯說是過去各種錯誤措置的總的暴露。戰事結束後，中國的黃金和外匯政策，在表面上雖有若干修正，但在本質上仍是戰時那一套。先就外匯政策說：三十五年二月間公佈的「開放外匯市場案」，仍然是依循過去的路線。此項措施所發生的最大弊害，可以納爲二點：其一，外匯買賣價格和國內生產成本的差距更形擴大，以致外貨可以有利地源源流入，不但扼殺了國內生產事業，而且消耗了大量外匯資源。匯價的呆定不變更加深了此種趨勢。原外匯辦法雖沒有規定二〇二〇對一的固定匯率，但在執行時，則完全根據此一

水準；直至去年八月，始行調整。由於匯率的呆定不變，匯價與物價的距離益遠。其二，原外匯辦法曾規定非三個月內所能輸入的商品，概不結匯。此項規定的原意，雖在防止資金的變相逃避，但呆板執行的結果，徒然便利了國外市場現貨的奢侈品及消費品的輸入，而使在國外必需定貨的資本品的進口陷於斷絕。去年八月十九日，政府始將美匯改訂三三五〇元，同時採行輸入許可辦法。但實施成績亦難令人滿意。因自八月改訂匯率以後，國內物價波動益烈。法定匯價和物價的距離仍繼續不斷的擴大。我們依國內物價和國外物價標準計算的眞實匯價，應在法定匯價（三三五〇）的四倍左右。法定匯價既已喪失其眞實意義，終使合法的輸出入貿易大量減低，非法的輸出入數量驟增。結果黑市外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黑市匯率亦自然隨着上升。在這種情勢下，資金的逃避和僑匯的流入黑市，也就無法作有效的制止。及至本年二月，政府鑑於情勢惡劣，又頒佈進口附加稅和出口津貼辦法。這次辦法的公佈，失敗得更快也更慘。差不多在辦法公佈的同日，出口貨市價立刻上漲一倍，完全冲消了原辦法的利益。不顧農業國家的產品有季節性，祗問商業利益而定的辦法，失敗是當然結果。另一方面，反引起美國的惡劣反響，考慮到要援用十年前所訂定以對付「納粹」傾銷的關稅條例，以對中國出口貨加徵進口特稅。所以這次辦法的公佈，不但無補於平衡國際貿易，而且更刺激國內經濟，并促成此次金鈔風潮的爆發。

抗戰期內，黃金本來已和物價脫離直接聯繫。在戰爭末期，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又恢復了其中間的聯繫。勝利後，政府更變更拋售期貨，改爲現金買賣，擴大黃金政策的施行。自去年三月八日開始拋售黃金以來，大概可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三月九日至四月廿七日止，是採用釘住政策，始終以一百六十萬元一條配售。第二階段是從四月廿七日起，改取隨市賣出政策。這在技術上雖爲進步，但拋售黃金的基本理論實有問題。黃金政策的運用，雖可吸收一部份的購買力，緩和物價的上昇，但它的運用必需具有若干條件。第一，惟有在金價與物價水準趨向平衡的條件下，黃金政策方能收到合理的效用。我們根據經濟統計，可知黃金價格常常隨着物價變動。但金價的劇烈波動，則勢必形成人民的恐慌心理，轉而刺激物價的飛漲。所以黃金政策的運用目的，決不是過度抑低金價，而應使黃金與物價的水準漸趨平衡；并依同一方向發展。如果我們定要硬壓金價，以求物價的穩定，不但徒勞無功，且有橫決的一天。這次的金潮，正是最現實的說明。其二，惟有在財政赤字不太大的條件下，黃金才能有吸水紙吸收餘水的功用。我們必須認識，黃金政策的運用，不但有其必要條件，而且有其一定限度。目前財政赤字日益擴大，兩年來通貨增發達三萬億元。財政部嚴厲管制金融業，不許國家銀行提高利率以吸收存款，却使絕大部份的現鈔變成不經正規銀行錢莊的游資。我們如果不從減少赤字，利導游資作根本的治療，則黃金政策遲早終要失敗。據政府公佈，本年歲出預算爲九萬三千餘億，收入爲七萬億。假定收入項目可靠，每月不敷亦在二千億以上。又依中央銀行配售黃金數字作一估計，去年十二月及本年一月共約配售黃金四萬條，連同暗中出售共約六萬條。假定每兩售價平均爲四十萬元，共計國幣二千四百億元。依靠這樣計算，則政府拋售黃金所得，約爲收付差數的六成。但是，政府到底有幾個四萬條可拋呢？

我們從各國金融史上看，如果某一國家在貿易上陷於逆勢，就只有貶低幣値，以促進輸出，減少輸入。我國却死釘住硬性的匯率，不特陷工商業於絕境，而且杜塞了僑匯和外來的投資。再則，如果一國在財政上無法平衡，就只有停止兌現，以減少金融的波動。而我國却以藏金奇絀的國家，實行無限制的拋售，以求通貨的收縮。由此可知，我國的黃金和外匯政策，實在和近代的金融原理完全背馳。它的失敗當然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這次金潮的成因約有下列數端：（一）由於政府當局假定去年年底前，國內可以完成和平，故偏重注意力於財政收支，而忽視國內生產之必需儘力增加，致對外收支失衡，國內經濟趨於崩潰。（二）由於政治的缺乏綜合性能，使政府機關各單位，各行其是。尤其是政治與經濟的脫節，使行政無力，政策落空。（三）由於匯價，金價和物價的重大脫節，以致輸出減少輸入激增，激成了黃金和外匯的猛烈跳動。（四）由於財政赤字的龐大，促成了游資的泛濫，不僅使黃金和外匯市場遭受重大的壓力，而且引起投機的心理和行爲。

二　我們的對策

這次黃金暴漲，引起物價大波動的敎訓，已激動整個政府及社會。我

們，應該作一全面的檢討。現在我們擬定對策，自然要依據前段所說的病源。這次金潮的成因既屬不一，那末對策的擬訂也必須是整個的，全面的。任何支節的或局部的辦法，都不能產生圓滿的效果。第一，我們必須設法消除外匯和物價間的差鉅，使之趨向於同一水準，以謀對外均衡的重建，消滅投機的客觀因素。我們要儘可能減縮黃金的活動範圍，使其不致影響物價。第二，我們必須設法利導游資，或減少游資所加於黃金和外匯的壓力。第三，我們必須採取有效的物價政策，以求國內經濟的穩定。

貨幣是交換的媒介品，其本身在國家經濟立場上說，並不是財富。黃金亦是媒介品之一，在法幣政策施行十餘年之後，爲什麼人民還不能信法幣而信黃金？政府的名器、勳章、貨幣、本來是人爲的榮譽或價格中準。施政的最要原則，在使人民信服此項中準，而遵守之。所以名器、勳章、都不可濫，貨幣尤不可濫。其他各國或有因溫和的通貨膨脹而獲收平衡國際收支的利益的，我國則感年來祗有膨脹之害。原因就在我國戰時生產萎縮，出口減至最少限度，戰後生產機構崩潰加劇，國際貿易入超額更巨。治本的方案，在增加生產，儘量增加生產。這中間當然要賴金融扶助方法的改進，稅收制度的糾正。然而國家的政策，原應該是整個的，不容許經濟財政及金融機關各行其是的；而配合運用的責任則應由行政院肩任。

在黃金美鈔領導物價的今日，我們首先要使金鈔脫離物價的聯繫。二月十七日政府公佈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其要點爲：一，禁止黃金買賣及外幣流通。二，調整外匯的美金掛牌爲一萬二千元。三，取消出口補助及進口附加辦法。四，標售敵僞及剩餘物資以裕財政收入。五，穩定工資，規定以本年一月份生活指數爲準。六，配售民生必需品。這方案，在表面上雖甚周密，但其實際效果，還待事實說明。人類的智識本來是經驗的累積。可是太囿於過去的經驗而不能自拔，亦易失敗。我們現在依據抗戰期內管制物價的經驗，來重行規定「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其結果恐難完全樂觀。

過去管制物價之所以失敗，其原因爲下列各端：一，因戶籍人口之乏缺正確統計，我國不能有效的實行定量配給或採用「點數制度」。二，行政幹部，尤其基層幹部能力低弱；且常思藉機貪汚。三，行政手續繁冗，不能適應機變。四，政府所能控制的物資數量太少，無法「以量製價」，發生平抑作用。五，各同業公會對同業控制力量薄弱，無法使市場配合政府之要求。六，游資充斥，且大都盲目蜂從，促進物價之躍進。這些因素目前依然存在，或且加甚。同時，在各種物價處於不平衡的狀態下，往往會引起爭競；而工價與物價更會互相競賽，趨向上漲。結果最倒霉的是薪水階級的公教人員，因爲薪津調整還落在物價競賽之後。當前的命題，是如何使各項物價及工價從速達到平衡線上。最低限度也應使薪水、工資、及物價作平頭的上漲。我國要發展國際貿易，整理通貨，從事建設，都必需這個前提的解決。做法，首在充實物資，不論這些物資是如何來的。我們的緊急方案，除了儘量輔助生產外，應該是：

一，取消進口管制辦法，從價徵稅。　因爲我國統計資料不具備，到底何種東西必需進口，某種東西應該進口多少數量，均缺乏依据。在管制進口時，幾萬張申請書倒無正確的審核尺度，准駁爲難，結果祗好因人而施，其事甚不合理；社會的消費量是有其飽和點的。去年一月至十月，物價漲勢相當平穩，其時的進口貨多實爲重要原因之一。許多奢侈品，如「玻璃」製品、香煙、洋酒等，進口商曾經有因到貨太多而蝕本的。至於資源品進口，對於缺乏物資的現階段我國，更是利多害少。爲保護本國工業，可暫時依賴徵稅的稅則。現在我國工業，其原料與工作機大部依賴舶來。而且現行的成品機器免稅，而原料征稅的辦法，更足陷一部份工業於困境。故取消進口管制，反多裨益。

二，政府所有外匯，一概留作建設、交通、水利等用途；不與人民以申請。　勝利以後，我國已耗費了幾億美元。然而眞正用於建設的百分比，卻不甚高。這等於建設資本的浪費。政府今後對於外匯的用途，應限於促進生產的間接用途，不用於直接生產的國營工業，以免與民爭利，而使國營民營的工業站在不平等的立場上競爭。人民所需求的外匯，自然會取之於黑市，而且也惟有這樣才能使存在美國的三億餘美元認爲有利可圖而換成物資輸入國內。我們實在懷疑政府一紙命令眞能使富商達官們的美國外匯前來登記，換取法幣或公債。祗有「利」才能誘好利的人來。富人不怕錢多，愈富者愈好錢，此乃古今中外的定律。或者有人以爲這樣是鼓勵黑市的存在，然而在管制進口的情形下，黑市外匯也一定仍然存在。最少限度，一批走私客是需要黑市外匯的，而我國現狀下，走私是無法根絕的

。這裡由很明白，用不到解釋。此外，一部份進口商自然會取得所需外匯於出口，而形成進口的自然聯鎖。

三，政府爲維持其外匯頭寸計，可儘量輸出。　我國的輸出物資不是金屬礦砂如鎢、銻、錫、汞，就是農產品的桐油、茶，絲、猪鬃、腸衣、皮革等。這些輸出物資，一部份現在仍是有利可圖，一部份也許因國內生產費用高昂而須賠錢。然爲政府計，譬如補貼出口。爲平衡國際貿易計；虧本亦無所謂。這正合近代國家的財政原理；鼓勵出口正是鼓勵農礦的生產，亦有益於廣大的農村與荒蕪的礦區。

四，公教人員的日用必需品由政府定量供給，進一步謀公務員的公給制。　在物價波動下的艱苦的公教人員，其米、油、煤、布、鹽、糖及住宅等均應由政府實物供應。今日一般人的收入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化費在食住兩項上的。政府如果能爲他們解決食住，則薪給微薄的痛苦也減輕了。進一步政府可辦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子女學校等等。其中的職教員即可由各機關的職員或其眷屬担任。公務員公給正可試驗新社會組織。不過在日用品供給的階段中，政府一定要避免現行行政機關的習慣，減省不必要的手續與表格。最簡單有效的辦法，是責成每一機關的總務單位或合作社，自行包辦其本機關的必需品的領取與分配，而不必層層報告，由中央的主管的大機關來審核。如果必要，不妨由監察院隨時巡迴抽査考察，以明瞭其人數與物品的數量是否配合即可。

五，政府指定機構控制大量的米、煤、油、鹽、糖等物資，並向衣料、肥皂、紙張、火柴等工業放款，收購其產品；除供應公教人員外，並用於平定市場物價。　我們認爲行政命令對於經濟行爲的效用是有限度的。經濟的問題一定要用經濟的方法去解決。要平定物價必需「以量控價」。政府以低利貸款扶助日用品工業，同時即作爲產品的定金。這樣就取締了中間商之操縱，對於金融與工業均有裨益；對於穩定市面更能有效。

六，提高銀行存款利率，以漸逐減低利率。　目前黑市利率在一角三分至一角八分，而銀行存息祇二分至八分。「爲淵敺魚」，結果社會上最大部份的資金均不在正規的銀行錢莊進出。許多人民且因地下錢莊或商舖的倒閉而本利兩失。然而，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政府應該爲大多數缺乏法律常識的人着想。爲開闢正當途徑，如果將國家銀行存款利率提高至八分，商業行莊存款到角二分，則人民爲保障其積蓄起見，自然會將存放於黑市的錢轉入正規行莊。等到黑市大致消滅後，行莊的存息亦可逐步減低，達到戰前的狀態。至於工貸利率，仍暫以四五分爲準。國家銀行存在放款利率之差額，應由國庫支撥。其實爲減少發行起見，這樣賠貼亦不是無利。因爲其差額不過三四分，政府約二十個月將人民存款加一倍，其發行額卻可減少了。

總之，我中國經濟現正面臨生死存亡的歧途。我們必須正視現實，拿出魄力，一掃過去支離破碎的事後補救，而追求全面的根本解決。最後我們必須認識，黃金問題只是經濟問題的一環。我們在企求解決物價和黃金問題時，不能不注意其他各種最有關係的因素。財政赤字和游資問題，實是今後經濟穩定的最大癥結。但游資和赤字問題又和國內政治密切聯繫。任何片面的解決，都不能發生眞正的效用。所以和平與行政效率的提高，還是政治與經濟改革方案的兩大基礎要素。

本刊增設

文化服務小廣告

一、本刊增設此種小廣告，純爲服務性質，使本刊讀者因本刊之傳佈，得交換達到其需要。

二、廣告內容以關於書籍、雜誌、報紙、地圖、儀器、樂器、文具、攝影機、自由車、書畫、郵票、照片等之徵求、出讓、交換，以及學校教員或家庭教師之徵求及徵職爲限。

三、照本刊實在成本，每一個字收費一百五十元，如係英文，每兩個字母作一個字計算。

四、讀者惠刊廣告時，字跡務須端正，將刊費連同廣告稿一併寄下，刊費可用郵票代理。（定戶請勿要求在定費內扣除，藉省手續。）

五、廣告上請註明刊登人之地址姓名，以便他人復信，本社恕不代爲轉信。

六、本社收到後，當依次刊出，不另給收據。惠件時，請於信封上角註明「小廣告」三字。

觀察通信版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長春通信）上星期長春又落了一場大雪，全城好像縮在棉絮裏，馬路上的雪已被車馬壓成堅冰，馬匹的汗水使全身都凝成白霜，行路人裹着最厚的衣服戰戰兢兢的在冰路上走，吐出像濃煙似的白氣。每一棟房子的玻璃窗都結了很厚的冰。五點鐘以後，天便黑了，街上的人紛紛散盡，全市像死了一般的冷靜。

這兩天的室外溫度達到零下三十四度；是今年最冷的日子，，從南方來的人眞是眞正領略了關外的風寒。天氣這樣冷，而仍有十幾萬個圓顱方趾的熱血動物在作着「露天遊戲」。兩個星期以來，他們日以繼夜的作着那明知吃不消，同時似乎沒有多大意義的「遊戲」，是他們眞不怕冷嗎？不是的，他們中間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怕冷的江南人，往往經不住凜冽的寒風而停止了呼吸倒入三尺深的雪中。

二十萬人「遊戲」

這是半年來一次非同小可的「遊戲」，雙方出動近二十萬人，並且出乎一般人的預料，主動的竟是中共部隊。去年秋末，孫立人的新一軍到長春永吉一帶來接替廖耀湘新六軍的防務，同時，曾澤生的六十軍（雲南軍隊）也調到松花江邊，這一套新的部署，使大家相信主動力量無疑在國軍這面，加之共方承認已將哈爾濱的重要物資移往更遠的佳木斯，中央的宣傳機構一再發表共軍每況愈下的消息，接收人員也紛紛討論哈爾濱攻下之後的計劃，於是人民十九都很自然的覺得哈爾濱隨時可拿下來，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問題只在什麼時候去拿，有人猜春暖雪融的時候，有人說要等松花江的冰經得起坦克車的時候。這種似緊張非緊張的情緒在人民胸中盤旋了四五個月之久。

松花江早就結了堅厚的冰，冬天的河景向來是死板板沒有什麼可看的，而一月六日夜間，松花江却重起波濤，震動了全東北的軍事神經。屯駐舒蘭的共軍突然以沙土鋪在冰上過河攻擊其塔木，這一下，牽動了二三百里的戰線。共軍這次似乎是有計劃的「冬季攻勢」，以配合關內平津，保定，徐州的攻勢。在最初十天的交接，國軍的處境極危，共軍陷其塔木逼近九台，燒毀了鐵路橋樑，切斷了電話線，炸毀了輸電塔；陶賴昭的共軍過江直下達家溝，獲得大量物資，而進迫德惠。長春與永吉受威脅，共軍又揚言：「打下吉林（即永吉）過年，到長春過元宵節。」

吉林省主席梁華盛在永吉坐鎮，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孫立人在長春指揮，長春警備司令部徹夜辦公，長吉兩地入夜即戒嚴，長春街頭最多的武裝同志與美式卡車突然稀少，長滿客車一再誤點，長吉客車停開，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的參謀長趙家驤自瀋來長指示機宜，副長官鄭洞國也來到長春駐守，軍事機關的新聞發佈組一連許多天「沒有消息」，這一切都表明局勢不大妙。

這好像是一樁比黃河堵口還緊急的堵口工作，中長路上的兵車絡繹不絕，也不知調來多少兵，總算把局面穩定下來，新聞發佈組也恢復了工作，並且在發佈的新聞裏用了「克復」，「追擊」等字眼。雖然有些地方還沒有克復下來，不過長春和永吉間總算轉危爲安。據軍方說：空軍出動八架飛機助戰予以幫忙不少。

趙家驤參謀長曾坐飛機到火線上低空視察，他看見成羣的大車滿載着共軍搶到的糧食向北運，所以他說：「共軍這次發動攻勢的目的是搶糧食和破壞長吉鐵路」。這兩項目的，前者是滿載而歸，後者也部分實現。共軍這次攻擊也算抓住了時機，因爲屯駐永吉附近的六十軍南調攻打樺甸，於是乘虛而入，掀起了吉林省冬天的災火。

長春陷入黑暗

這一戰，長春所受到的直接影響是斷了電源，自十六日起，一連五天全城陷入黑暗之中，長春的電源來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小豐滿水力發電廠，共軍衝至九台附近把支架電線的鐵塔炸倒了一座，當時因爲正當兩軍衝殺之際，所以一直到二十日才勉强修復。停電對長春市民的影響相當大，沒有電便沒有水，生活便起了恐慌，當局爲解救水荒，便扣下了預發售給市民的平價煤，用來發電。長春市內日本人早就預備了一座火力發電廠，以防萬一，現在這座發電廠自從接收之後，資委會東北電力局認爲長春決不致缺電，於是把兩座大的發電機拆卸，打算運到鞍山去，因此剩下來的兩座小發電機便不能供給全長春的電力，而只能應付自來水廠及軍事機關了。五天停電期間，全市大小工廠全部停擺，一些微弱的民主工業生產也就等於零，若干想在舊歷年前加工生產以換取較豐厚利潤的小工業者，也就大失所望。

那五天，一切都好像失去了重心，物價像趁火打劫似的漲了一倍，漲得人民更心慌意亂，他們畏懼物價的襲擊遠甚於畏懼「八路」，雖然趕在春節，而市面並不顯得繁榮，往年最賺錢的年貨生意，今年都斷了本。煤炭價格上升得比氣溫降的快，有些人便不得不以作飼料與食料的豆餅高粱來作燃料。晚上六點鐘，全市如放了緊急警報似的成了死城。

長春的十四家報紙在停電期間出了聯合版，由中央日報編中央社的新聞稿，實際上，十四家報館早就不必各自爲政，言論的道路一向是由刀闊闢出來的，十四家之中只有兩家民營報紙，選擇稿件稍不

留意便會受到警告的處分，其他多半都是軍報，在東北的軍隊，甚至於每一師都有一個報，所以東北的輿論是槍桿子支起來的，這話一點也不誇張。報紙最近都奉令慶祝憲法誕生，宣揚民主，刊載着許多和老百姓開玩笑的文章。（李鵬長春人口有三分之二是文盲）。在這塊絕對「軍治」的地域裏，談民主簡直有如癡人說夢，昨天就發生軍警無理毒打長春大學學生的事，剌刀的亮光照耀得人民睜不開眼睛。

冰冷的人心

在這劇烈的動盪時期，是撫摸人民心情的好時候，長春市民對於戰事的動態都心裏有數，但他們的反應是可驚的淡漠，我曾經問過很多東北人，問他們怕不怕八路打進來，他們有的說：「八路來了也不會怎樣」。有的說：「我們看了七個月的中央，兩個月的八路，半年多的大鼻子（蘇聯人），誰來都一樣，我們怕件麼！」又有的說：「要我們再像日本降伏後，盼爹娘似的盼好日子，是不可能了。」我發現在這軍事鬥爭最尖銳地帶的人民，他們對於以鎗砲爭取的政治，認識得更模糊，甚至於咀咒；在這最不安全地帶的人民，他們對於「安全」兩字的意義，已不再去找確切的解釋。

在長春時常可以碰到從「解放區」流亡來的難民，裏面有地主的兒子，有商人的子弟，他們以前都是很過得去的人，現在被「清算」出來，每人都有一大篇含血帶淚的故事，他們多半是年青男子，跑出來的主要原因是怕抓丁。長春如今正有成千成萬的「他們」，在尋覓一天兩餐高粱飯，同時想盡辦法避逃這方面的兵役，

據說被共軍抓去的壯丁很不少，還沒學會搬鎗機，便要他們打衝鋒，一下子便被國軍生擒活捉起來，問明是無色彩善良的莊稼漢，便又命令他們補上空額打回去，運氣好的眞可以七擒七縱，結果當然是一死了之。那些死魂靈假如眞一旦知道他們是爲「和平與民主」而死的，他們的一聲長嘆，會把剛剛制成的民主憲法連根吹掉。

環境竟眞的逼得東北老百姓懷緬「康德年間」的生活，逼得他們有意或無意的數念日本人的好處，聽了他們的話，看看當前的環境，使人眞不敢去毆斷他們這最現實的感慨，這種悲劇演下去，會很難收尾的。

一年來戰亂所產生出來的傑作是數千萬顆冰冷的心，我在東北人民的表情上看不出什麼溫暖，他們現在似乎對什麼都不起勁，他們的腦子原來是一張白紙，準備接受眞美善的印跡，現在那張白紙已被硝烟薰模糊了。青年人多半都苦悶，他們深感思想無法表現的痛苦，因爲有人已把他們的思想像操體操一樣的定型化了，他們經過十四年的閉塞，深恐仍逃不脫井底之蛙的命運，甚至於那井口都在漸漸縮小。重入祖國懷抱的東北人民發現祖國並不像一個慈祥的母親，而是一個邋遢、醜惡、營養不良、脾氣暴戾的瘋婆子，他們一顆沸騰的心，怎不變成冰冷？他們感覺不能愛所愛和恨所恨，於是他們的心更冷了，一切都等待着上帝來安排。我担保即或北平美軍強姦了一百個沈崇，也不會在東北引起什麼同情的波瀾，因爲他們必須聽着喊一二三四，不能走錯一步，同時他們也有一大堆舊恨來比這些新恨，有人會說：「日本人和蘇聯人強姦了千萬東北婦女，又該怎麼樣呢？」所以受刺激愈多的人，往往是最沈默的人，一旦舊恨新愁累積不下的時候，那顆冰冷的心也就要跳動了，那一跳動是很可怕的。

和李初黎聊天

當松花江畔的戰事正激烈的時候，我曾去訪問軍調長春分部共方代表李初黎少將。李初黎也是現在中共的中堅份子，從前和李立三一樣活躍過。他是四川人。雖然年紀不過四十多歲，而頭髮已灰白了。他對於軍事却以「不大清楚」四個字支吾過去，問他軍調部有無作用，他說「軍調部這個執行機關所定出來的原則，有一方面不遵守便不能發生作用，現在根本沒有事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他認爲東北最近不會發生什麼大的戰爭，國軍進兵哈爾濱不是容易事，他指出：「國軍在東北的兵力根本不足，假如攻哈爾濱，一定會顧此失彼，國軍總是沿着中長路調來調去，四百輛車皮多半變成了運兵車，在幾個中心點總是扣住一批火車準備隨時調動，東北各地鬧煤荒，而撫順煤鑛堆積得要起火，這都是火車被拉去送兵的原故。」說到中長路便想起中蘇條約，他說：「中蘇條約上規定中長路是不能送兵的，既然國民黨違約送兵，所以在共區的中長路一樣送兵。大連市內沒有共軍，蘇聯當然願意中央政府去接收，但不贊成開起軍隊去接收，因爲條約上規定大連是商港。」

「國共問題總是要設法去解決的，李先生看有什麼辦法打開目前的僵局？」我急於要把話鋒轉到正題。

「依照周恩來所提的兩個原則恢復政協會議，國大與憲法共黨決不承認，先把它們擱置不談，趕快先舉行和談，共黨願意在公平原則下再試驗一次，至於改組政府，是騙人的勾當，也應該擱置不談，把停戰弄好再說別的。」李答。

「馬帥不是說憲法相當民主嗎？你們是不是只反對產生這部憲法的形式，而對內容尙感滿意呢？」

「我們都反對，我認爲曹昆所制定的憲法就很好，漂亮話不兌現是沒有用的」，「那麼停戰還有什麼成問題的呢？」

「國民黨的誠意，」李初黎肯定的說，「我們和國民黨周旋二十年了，决不能永遠上當，永遠上當的人才是不可饒恕的傻子」。

「你覺得那個誠意是决定於國民黨全體呢？少數人呢？一個人呢？」

「决定於一個人！」他直截了當的說。

軍調部的糾紛

後來我們又談到馬歇爾返國前的聲明，他認爲還「說出一部分實際情形」。說到馬帥所提的「共黨內之自由份子」，他說：「假如自由份子的定義是馬帥所說的

爭取民主與和平的人士，那麼所有共產黨員都是自由份子。」共黨中的極端份子他不談，甚至於表示沒有那種份子，而他認爲國民黨的確有極端份子，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同時他也承認國民黨有開明的民主份子，共黨願與他們共謀中國的和平，除了邵力子，他特別提出「張治中將軍」來。關於將來中國政府所應採的形式，他認爲馬帥沒有深切明瞭中國情形。

最後他又向我吹噓了許多「清算」，「翻身」，「土地重分配」的好處，他也認爲中國要發展工業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他贊成不妨礙主權的外國投資；反對官僚資本壟斷和美國最近的經濟侵略。他談了一個鐘頭，他吸了七八支駱駝牌香烟。

過了幾天便聽見軍調分部中共方面電台被扣，人員被監視的消息，鬧得執行和平任務的軍調部也不和平了，政府方面堅持說中共軍調人員在松花江戰事進行時，有傳遞情報的舉動，中共則認爲有損尊嚴，不能在一起工作，便不妨拆台，嚷着要全體撤退，弄得美國人每天轉遞雙方的公文，毫無辦法，鬧到北平軍調總部，到現在還未解決。

春節後，長春軍調部從中長路理事會大樓遷到昔僞滿國務院大樓內，勵志社最近以三千萬元流通券把僞滿國務院修飾一新，的確美輪美奐，富麗堂皇，很像每月開支五億元的機關。在裏面又遇見李初黎少將，談起電台被扣事，他說：「我們的自由只在這座大樓內！」說罷搖頭不已。

政府方面的周參謀長勵武仍是指摘共方不應利用電台通情報，我問他：「工作忙嗎？」他說：「沒有事！」「軍調部會撤消嗎？」「還談不到。」「那麼怎樣調處呢？」「等美蘇間的關係弄好，中國的事情自然容明解決！」

都得了便宜

吉林之戰到今天總算告一段落，共方誇耀他們的戰果說：「我們攻過了松花江，打到長吉鐵路的九台，這椿事實便足以證明那方面的損失大！」國軍方面的消息說：「共軍冬季蠢動完全失敗，被我們追擊得狼狽過江，得不償失，遺屍遍野，現在我們正替他們收屍。每十個凍僵的屍體捆成一捆，用大車拉走埋掉，每輛大車至少拉兩捆，我們出動了四百七十輛大車，有這些數字便夠了。」兩方面說得都很有理，都得了便宜，損失最大的當然又是老百姓了。

像發瘧疾似的，間歇一陣，便殺斫一場。放眼看着國際間，也充滿了矛盾，眞令人感嘆這荒謬的世界。前些日子，我在瀋陽一家最好的旅館裏，看見七八個蘇聯人很安閒的打彈子，旁邊桌子坐着幾個忙得滿頭大汗的軍調部美國飛行員，三四個中國政府招待員忙着給美國人掛酒遞烟，兩個日本下女謙卑的立在一傍伺候三國貴賓。看了這幅國際圖畫，怎不令人感嘆這世界的荒謬。

元月廿九日夜

暴政驅民於亂

西康的民變夷變

以殘殺對殘殺以刼掠對刼掠

暴民過處屍骸遍野廬舍爲墟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去年十月，西康與四川相毗連的邊境榮經及其附近，醞釀騷動；起初地方政府漠視不問，十一月戰禍掀起，又諱莫如深，於是七八個縣境遂被蹂躪，地方糜爛不堪。同時在另一個角落，西昌越嶲間的普雄又以同一原因惹起夷變。這兩處的變亂，規模雖不及國共內戰的慘巨，但也算是十數萬人的自相殘殺。

民變最先發動於雅安，名山縣匪首趙國祥率匪徒於卅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犯雅安北里被擊潰。十二月二十六日，榮經匪首朱世正、朱靜泉，車霖、包三嫂、廖國光等，洗刼榮屬花灘榮河雙江三場。本年元旦，天全匪首李元亨、荀和芳、王正亭、劉榮等，擄刼天全縣城。三日晨，李元亨趙國祥等與蘆山匪首程志武、周文部、名山匪首盧本務等洗刼蘆山縣城，並佔據川康要隘飛仙關，進據雅安、名山、榮經、邛崍，一部佔領寶興縣城，截至今日爲止，暴衆已進追榮經城下。以上所謂匪首，係根據西康省府所稱，此輩暴民自稱之名目甚衆，如「人民自衛軍」，「人民民主軍」，「抗劉軍」，「共軍人民軍」等。目前已有統一組織，領袖是「人民自衛總司令」程志武，蘆山程家壩地方的自耕農。其參謀長姓徐，匪中傳稱係中共中委。總司令之下轄七路司令，卽李元亨、趙國祥、包三嫂、周文部等，包三嫂號稱先鋒；路司令之下有支隊、中隊、分隊等名目。人數經重慶大公報及成都中興（央）日報稱爲萬餘人。（實際不止此數，觀其攻城掠地，如入無人之境可見）。活動區域頗廣，除中心區域天蘆榮寶名邛雅等七八縣外，北及四川松潘懋功，南及峨眉越嶲，南北縱長二千餘里。

夷亂區域不能在地圖上詳明指出，因爲叛夷所居之普雄區地接川康滇三省，人數約六十餘萬，武裝力量五六千人；但所有居住大小涼山的夷人共達二百餘萬，兩山佔地縱橫亦數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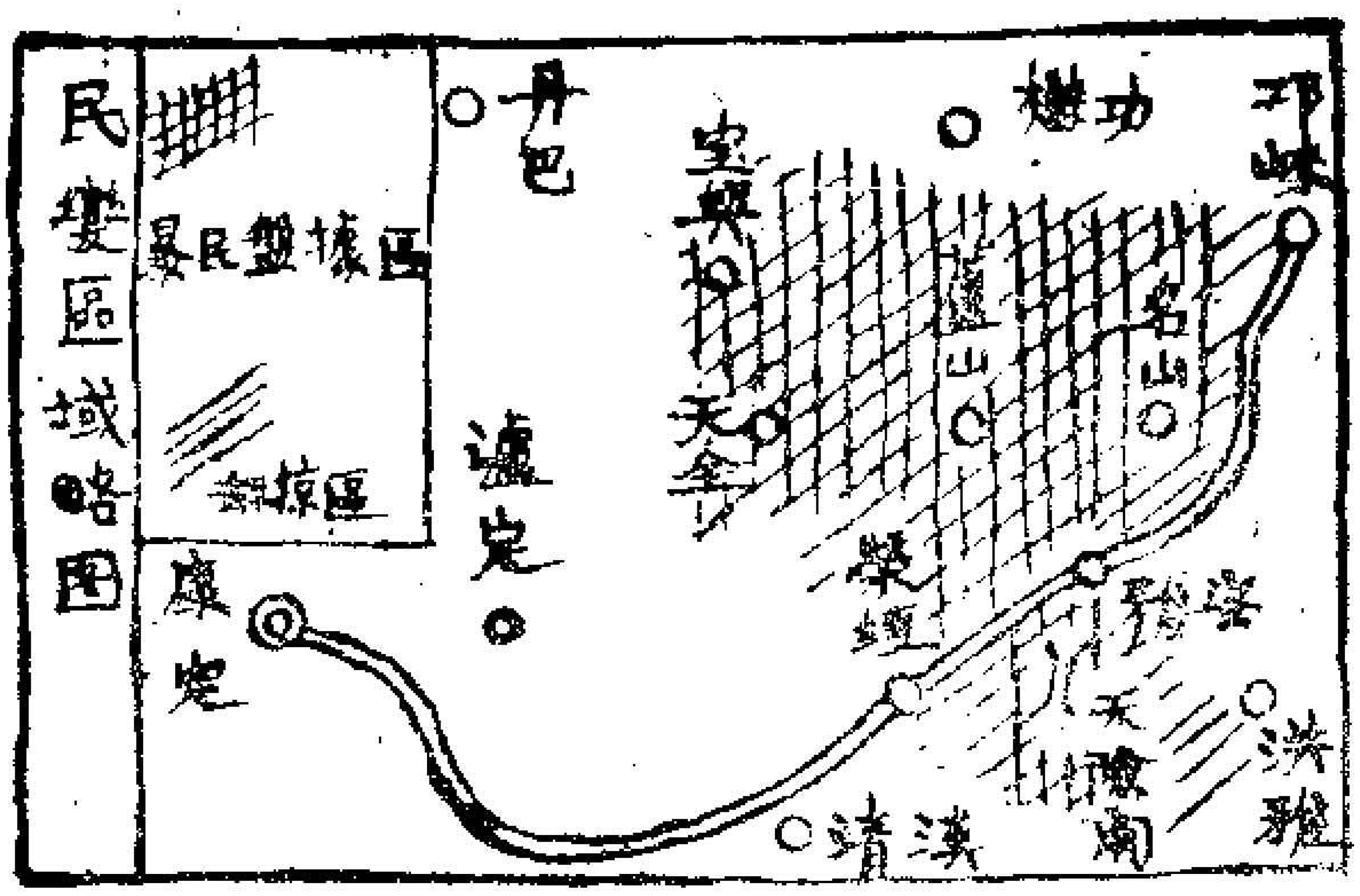
這些人民同夷胞爲什麼要叛亂？我們只要一加探尋，就可找到它的原因，那就是暴政驅迫他們這樣作的。這暴政是誰加在他們身上的？就是割據地方的軍閥西康省府主席劉文輝同他的子姪部屬加在他們身上的。這兩件亂事

的背景非常複雜，事態的嚴重也有加無減；據劉文輝同他的女婿伍培英（二十四軍的副軍長，軍長是劉文輝的姪兒劉元瑭）對新聞記者的談話，認為兩地的戰爭都是為禁煙而起，匪衆不過三千人，，早已擊潰平息；不幸在他們先後談話的時候，正是寶興縣城失守同榮經告急的日子。現在記者就兩事的發展經過簡單的告訴讀者。

普雄夷亂的原因比較簡單，戰爭却較激烈。倮倮族人之叛亂，據劉文輝氏說來，完全是执劃煙苗而起，眞正的原因却並非如此，主要是由於種族隔閡，再加上一層近因，於是屠殺的悲劇就演出了。向來治理普雄區夷胞的官吏靖邊司令是漢族鄧琇廷，此人深為夷人所崇敬拜服，他死後，由他的兒子鄧德亮繼承；數十年來就靠着鄧琇廷還個人使普雄區相安無事。去年劉文輝免鄧德亮職，改派他的旅長孫子文擔任；孫氏就任以後，一改前任作風，以武力推行劉文輝氏治康政策，實行公煙制度，遂引起倮倮族的不滿而叛變。第一次戰爭延長數月，康軍大敗，主力劉元瑄旅（劉文輝之姪）損失過半，輕重機槍六十挺步槍千隻被擄；是為第一期剿夷戰爭。自此以後，叛夷威脅及川滇兩省，並有礙於國防，（此區域有一國防鐵道線正在勘測中，據云美軍柯克上校等之獸獵康境及美軍搜索失蹤官兵隊之進入涼山均與此有關。）因此第二期剿夷戰事開始。此次戰爭除川境國軍（並非川軍）一師及滇境部隊之外，康境軍隊共出動五團（計劉孫各二團及國軍九十八軍一團），重慶大公報同成都中興（央）日報還說是有五架飛機參加戰鬥。這第二期戰事，於去年十一月就在準備並進行序幕戰；今年一月十五日方大舉進攻，因衆寡懸殊，夷胞在一對五的劣勢同空中攻擊下，退出上普雄，改守中普雄，官軍今又已攻入中普雄的前哨據點羅耳門吉。大公報西康通訊謂此第二期戰事的直接原因乃是不必要的，係劉元瑄為報戰敗之恥而發動。普雄方面的夷胞雖然敗退了，可是在他處的夷胞也有乘機叛亂的，比較嚴重的是在敘永，雷波同西昌三地發生，西昌以北的數百倮倮已攻至蘆山南境，很可能已與蘆山等地暴民取得聯絡。

夷變的原因據劉文輝說也是為反抗劃煙而起，在一個稍為知道一點康情的人聽來，都曉得這是一句謊話，因為十八年來，劉氏在康的主要政治設施，便是提倡種煙。以往康省的煙是人民自種，然後由劉氏及其子姪僚屬強力收購，用武裝押運統銷川省。三十三年，中樞當局曾召劉赴渝，有所責斥，彼方稍為斂跡；及至彼加入政學系之後，以有所恃而無恐，於是康省府遂正式迫民種煙矣。康省的種煙政策是這樣的，規定所有宜於種煙的土地均須種煙，若人民不種煙則抽「懶捐」，其捐稅率為百分之百，即依據此一不種煙的土地所可能產出之煙土總額，令土地所有人折款繳納。若種煙，則下種時有「下種稅」，煙苗出土則有「免剷稅」，此兩種比較低，共約百分之十；到收穫時則須繳納百分之三十至六十的「官煙」與政府。實際煙民收穫只有百分之三十。如此巨大的捐稅是否能為煙民換來安全呢？答案乃是否定的。有時中樞責令過嚴，或是其他壓力過甚，少不得又要抓幾個煙民來槍斃；有時軍隊會借剿匪為名，所過之處，一掃而空，煙民一年辛苦所得之三成又化為烏有。前年榮經即因此發生過一度叛變。去年榮經農民乃相約不種煙苗，康省地方政府竟強人民完納懶捐，遂直接引起此次民變。

「民變」這一名詞在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口頭是否認的，他認這不過是匪徒——煙匪與土匪的竄擾而已；但重慶行轅副主任兼西昌警備司令賀國光却說是民變。劉氏雖竭力否認是民變，我們仍可從他的嘴裏找到可以稱作民變的根據。我們知道土匪與煙匪的行徑是經濟性的，而此次動亂却是政治性的。劉氏自南京返蓉時，曾公開宣稱此項暴動係失意份子乘京渝蓉康各地謠傳渠在南京被扣並由張篤倫主康之時起事，顯與所謂「倒劉運動」有關連；這樣豈不是自己招承是政治性的民變。賀國光氏在重慶對記者稱康省民變，應用政治方式解決；劉氏快婿伍培英稱朱匪等「乃當地惡棍，野心甚大，前遭失敗，今欲擾亂治安：及來歷不明之奸嫌徐某，策動大規模有計劃之暴動。」如此又豈非「民變」？再看所謂匪徒的份子組織，總司令是自耕農，參謀長是「中共中委」，「他下面還有不少的幹部曾經參加過抗戰（編餘還鄉的），與中央軍校畢業生；在政治方面有一個西康政治革新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包括部隊政工人員與西康各地的黨政軍人士和學生。他們的主要口號是：一，反抗黑暗暴政；二，打倒劉文輝，改組康政府；三　請中央派大員調查西康眞象，尊重民意，辨別是非。他們到處宣稱：「既要強迫我們種烟，又要抽公烟，還要剷烟同殺我們！」大家看一看，這怎的不是民變。



暴民們的口號喊得那樣正大響亮，但他們的手段却恰恰與之相反，他們過處是屍骸遍野，廬舍為墟！他們使用非常精良的手榴彈，美式快槍，輕重機槍，迫擊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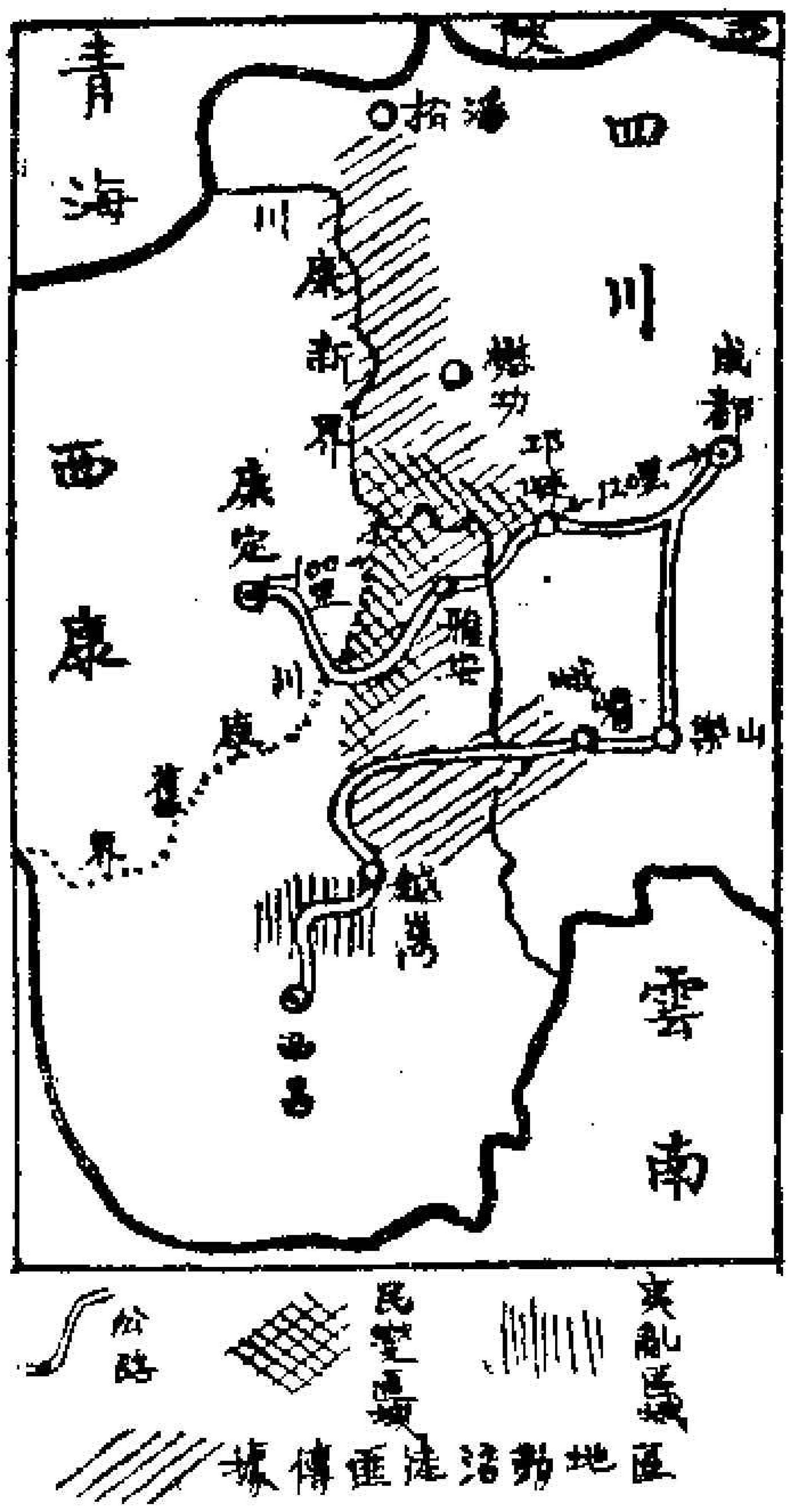
，和小型大砲，這些都是幾年來販烟的人與他們物物交易用作換烟的。他們更有設備齊全的具體而微的兵工廠，還設有無線電台，用作傳遞命令與至今未能查明的地方聯絡。

在所有被暴民侵陷的各縣城村鎮中，以蘆山被禍最巨，各地暴民集中一處搶刧達三日之久，迨官軍四處攻進，方撤往他處；惟此三日之中，全城居民未及逃亡者悉被殺死，政府人員及國民黨青年團的黨團員尤爲主要目標，民房亦幾全燬。據刼後餘生之康省某縣府一科長言，當傳奇人物式的包三嬸搶刼蘆山西康省銀行時，背負嬰孩手持雙槍，一躍而入，逢人便擊，匪衆繼入，頃刻之間全行徹底變一新面目。彼同事六人倶於此時被俘，其中一人年老被殺，剩下壯健之五人則被迫作運伕並構築工事；一夜乘戰事緊張時圖逃，爲暴衆發覺，除彼倖死得免外，其他四人全被擊斃。此人並稱幸而遇到的是「人民自衛軍」，少壯者尚得全命，若遇「抗劇軍」，則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殺。

戰爭以飛仙關之戰蘆山之戰滎經之戰三役爲最猛烈。飛仙關在雅安西南，地當雅天蘆滎等縣相毗連處，爲川康門戶；暴衆佔領飛仙關後，進距雅安城區四十里，砲聲整日傳入雅城，若果雅安被佔，則暴衆可由雅至蓉二百里間長驅直入，蓋地勢平坦，防守極不易也。差幸雅安在事實上早成西康省會，（劉文輝及劉元瑭等均駐節於此，因康定交通不便，且不甚安穩，）駐軍爲康軍總數三分之一，計有五團之衆，爲保家起見，此戰由劉元瑭親自指揮，攻取飛仙關時歷兩晝夜，並以四百萬元購死士四十人懷彈仰攻，始奪回。蘆山之戰，則在一月廿日，諸路暴衆會合該處，再度圍城，二十一日將縣城攻陷；康軍以有機可將「匪部」一網打盡，大事增援進擊：計副師長毛國球追剿趙國祚；四零九團追剿朱世正，傳朱陣亡於天全；劉元琮師長（亦劉文輝姪）則迫使程志武李元亨包三嬸退入寶興滎經兩地。程志武在寶興與康政府軍作拉鋸戰，三進三出，後將康軍劉元珂團長（劉文輝姪）俘虜，遂據有該城。包三嬸部退據滎經境內，企圖攻佔縣城，遂又展開滎經戰役。包部進入滎經，由東面向縣城進撲逼近城區三四十里的大屯場梓樹宮五里山藍家岌等地，守軍民衆自衛第三大隊陳伯昌率隊不戰而遁。康軍四一零團趕至，一場激戰，暴衆乃改竄洪雅；此役俘「匪首」翁達恩，鄒榮光，劉大立三名。

因當方嚴密封鎖變亂消息，加之交通不便，故眞象傳出甚遲，據今日所知，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暴民動態大約下：寶興城在程志武手中，李元亨在天全新場，

民變及夷亂區位置略圖



包三嬸在滎經花灘場，趙國祚在蘆山七老場。戰鬥形態則蘆山以北至寶興一帶，官軍以「地勢險阻，械運艱難，不敢深入窮追」。此線由西康保安司令周某與程志武相持於鐵關。在天全雅安間之青山腳閣子岡等處有「匪」一股，出沒無常；另一股在滎雅道上之雞子岡，有擾雅安企圖；一股在蘆山雅安間之中里張家坪一帶。滎經潰敗者則竄洪雅境內。現重心在鐵關雅安同洪雅三地。暴衆的實力，據伍培英稱「早在一月廿六日以後各地匪患均告敉平」；事實上，康軍方面正式消息謂：「擾竄康屬之匪，自天蘆退出後，損失不大，實力未虧。」成都一般報紙論調均以爲：「依目前情形而論，天蘆滎三處之股匪，非西康兵力短時所能肅清。」換言之，就是說康省的民變正是方興未艾。

根據如上的事實，康省的亂事已給給出一個輪廓，無論民變夷變都是政治上的原因造成，吾人認爲只有在政治上去謀解決，同時大家應當密切注意它的發展，不要認爲上普雄同天蘆等城的收復是變亂的終結。昨日據西康省府某高級官員告訊者，劉文輝主席已向中央引咎辭職，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好的消息，至少這可去掉暴民的口實。

在一月下旬還有一項插曲替變亂染上更濃厚的政治色彩：一是傳說中的「匪軍」參謀長徐某並非中共中委而係國民黨中委，加以匪軍中多有國民黨員與乎在南京派處公開進行的倒劉運動背景的流露，遂有人說民變是政府對劉文輝耍的政治把戲。還有說是青年黨幹的：在半月前洪雅國民黨黨部拘押青年黨黨員王憲模，封閉該黨所辦書店與報館；昨日成都西南新聞揭載一文（此報聞與中統有關），揭露西康人民軍眞像，說是青年黨反政府的軍事行動，王即主持人，因而爲洪雅黨部所拘；此即轟傳一時的洪雅事件。由此我們可知我國三大政黨——國共青均已被指作蠂使民變者，黨禍之烈，一至於此，實令眞正的老百姓寒心！

（一月卅一日寄）

週末闢欄

西化問題的側面觀

季羨林

什麼是西化問題呢？這我似乎有點明白，又似乎不明白。理論方面我總覺得有點深奧；所以十幾年前當許多名流學者熱烈討論這問題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這樣大的勇氣和決心把一篇討論西化問題的文章從頭到尾看完過。只知道最初有什麼全盤西化的論調，後來又有人出來提倡中國本位文化，眞可以說是熱鬧。但我卻像一個看足球決賽的旁觀者，陪球員高興一陣，甚至手舞足蹈的時候都有；終於還是回家睡大覺，人家的勝負與我毫不相干。不過我想在這裏附帶說一句：倘若當時參加討論的名流學者們能把一百年以前俄國學者討論西化或斯拉夫本位文化的文章拿來看一看，也許可以省下許多筆墨紙張。

理論既然不明白了，那麼我們就談幾個實際的例子吧！不過我仍然要聲明，連這幾個實際例子我也未必眞明白，只是覺得似乎有點明白了而已。

我們先談飛機。倘若眞正要西化的話，無論是不是「全盤」，飛機大概總要「化」過來的。我這話似乎又有語病，因爲一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爲飛機也是「古已有之」的。據說孫臏或墨子曾製過能在空中飛行的木鳶，這就是現代飛機的始祖。這樣一來，似乎西洋的飛機還是從我們中國「化」去的。我不反對這說法，這是替我們黃帝子孫們增光的事情。不過，我們的木鳶不但沒變成飛機，甚至連木鳶現在也看不見了。人家的飛機卻天天在我們的天空裏飛。沒有辦法，只好還是到西方去學，而且現在也就正在學中。

學成了會成什麼樣子呢？這我有點說不上來。我雖然上下古今亂談，但究竟沒學過算卦，現在不能預言。無已，我們就先談從外國買來的飛機吧！

飛機買來的時候，大概還是新的。於是就有人來駕駛，天天在天空裏飛。我們的駕駛員並不笨，也能像西洋人一樣要出許多花樣，或者還更多。當飛機落到地上，他們從裏面走下來的時候，樣子異常地神氣。穿了全副的美式配備，臂上掛了如花的少女，高視闊步，昂然走在街上。雖然他們現在是在地面上，但看神氣卻仍然彷彿從天空裏往下看一樣，這些凡人們在他們眼裏都只像螞蟻一般大小。世界是屬於他們的。

就這樣，一天天地下去。他們愈來愈神氣，飛機也愈來愈舊。間或這裏掉了一個螺旋，那裏缺了點什麼，或者什麼地方應該擦一點油了，普通大概是不會發見的；因爲飛機買來是在天空裏飛的，既然落到地上，管牠幹什麼？而且我們的駕駛員們還有別的心事，每天看報紙，先要看黃金的漲落，上海比北平究竟差多少，値不値一帶，這些都需要很多的精神。即使碰巧發現了飛機有點小毛病，覺得也沒有什麼嚴重，掉了個小螺旋有什麼關係呢？模模糊糊對付着能飛就行了。像西洋人那樣在飛機起飛前嚴密的檢查更沒有必要了。於是照常駕駛，飛機也就照常飛。然而說不定那一天這飛機忽然「失事」了。於是報紙用大字登出來，這裏打電報，那裏作報告，連「最高當局」也「震怒」了，當然又下了「手令」。一時眞像煞有介事。但過了不久，除了受難者的家屬以外，人們對這事情都漸漸淡漠下來。報紙上也就再沒有下文。當然更不會有人追問。反正自己沒有被難，管這些閒事幹什麼？不久這件事就被埋在遺忘裏。於是，天下太平，皆大歡喜。又有新買來的飛機在天空裏飛。

從飛機我想到鐘表。時間本來是很神祕的東西，是聯綿不斷的。鐘表就是用來把時間分割開來的。這當然是一個很笨的無可奈何的辦法，一定要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分割應該統一。一個地方或一個城市的時間無論如何應該一致。倘若你的表是五點，我的是十點，另外一個第三者的是十二點，那麼鐘表還有什麼意義呢？

鐘表是歐洲人發明的，關於時間統一這一點他們總算作到了。有些需要精確時間的地方甚至一分一秒都不差。但自從明末天主教士把鐘表帶到中國來以後，鐘表大概也震驚於我們精神文化的偉大，把在歐洲時的作風漸漸改變了。滿清皇宮裏和貴族家裏的鐘表，譬如說賈府上的，改變到什麼程度，因爲我究竟不是歷史家，有點考據不上來。沒有辦法，只好舉眼前的例子。北平一個學校裏當然有很多的鐘，幾乎每間辦公室裏都有。數目雖然多，但沒有兩個鐘的時間是一樣的。工友拿來當作標準搖鈴的一個鐘，也許有點年高德劭了，每天總慢走五分鐘。三天以後就會慢到一刻鐘。然而這就是這一院的標準時間。有人告訴工友，工友說他知道。問他爲什麼不撥正了，他說，只差一刻鐘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上課時間總會是五十分鐘的。同時另外一個離這裏不遠的院裏的鐘，大概走得比較對一點。結果是兩院搖鈴的時間相差一刻鐘，這裏還沒下課，那裏已經上課了。在兩院都有課的同學就眞有點「傷腦筋」了。一天我看到一位德國先生用了跑百米的姿勢衝進學校裏來，頭上滿是汗。到了，他纔知道，原來學校裏連預備鈴還沒有搖。另一天，我下了課去趕汽車，計算時間可以趕得上，但汽車卻早已開走了。

在北平這古城裏，像這樣的鐘還多得很。大馬路旁的所謂標準鐘，銀行大樓上的大鐘，樣子都很堂皇神氣；但倘若仔細觀察就都有問題。有的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就乾脆不走。有的性急，總是走在時間前面，讓時間在後面拚命追。有的性慢，反正據哲學家說，時間是永恆的，馬路上又終天有熱鬧可看，有美國吉普車撞三輪，有軍人打汽車售票生，慢慢地走着瞧吧！慌什麼呢？於是這些堂皇的鐘就各自爲政起來。

倘若乾脆不走，我不反對。因爲從不知多久以來，鐘表對許多人們就只是一件裝飾品，像鑽石戒指什麼的，雖然他們原來不是用來作裝飾品的。這次大戰的時候，德國人有幾年沒有看到咖啡，一個雜誌就提議把咖啡豆鑲在白金戒指上代替鑽石。咖啡豆都有當裝飾品的資格，何況鐘表呢？歐洲的，恐怕我們中國

的也一樣，貴夫人赴夜會的時候，穿了晚禮服，脖子上掛了眞的或假的珠子，手腕上帶了金表，珠光寶氣，炫人眼睛。但一說到時間，就回頭問自己的丈夫。原來她們的表從買來後就沒有走過。所以有一個時期我想提議；以後替女太太們製手表，裏面不必用機器，只用一塊金子，作成表形，用筆畫上鐘點就行了。倘若這位太太喜歡八點鐘，就畫上八點；倘若她喜歡九點鐘，就畫上九點；依此類推，無論什麽時候看，都只是一個樣，這多有意思？還可以從她們喜歡的鐘點上替她們起渾名，譬如八點太太九點太太等等。心理學家可以從這裏推測這些太太們的個性。象徵派詩人也可以從這些鐘點上幻想出這些太太們的靈魂是紅的，或是綠的，豈不很熱鬧有趣？反正人們都知道太太們的金表多半是不走的，不會誤事。

但我們的鐘表却偏不這樣簡單，牠們也走也不走。我們不知道牠們什麽時候走，什麽時候不走；那一隻走，那一隻不走。在鐘表沒有輸入以前，我們中國人大概是頗快樂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多麽簡單明白？太陽反正不會罷工，而且有目共覩。當時雖然也有什麽漏，但也只是貴族人家的玩意兒，與一般平民無干。「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不是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嚮往這境界麽？但鐘表偏要擠進來。據一位哲學家說，我們中國的思想是有「完整性」的，用我的話說，就是混沌一團。可惜自從鐘表擠進來以後，這「完整性」有點難於保持了。這眞是大可哀的事情。

另外一件大可哀的事情就是抽水馬桶的輸入。以前我在北平讀書的時候，常聽到剛回國的留學生們的偉論，讀到他們的文章。既然鍍過金了，再看到我們這古老的國家，就難免有許多感慨。但第一件讓他們不滿意的却是在中國有很多地方沒有抽水馬桶。這當然有很充足的理由。誰不知道坐抽水馬桶的乾淨方便呢？但也有一個先决條件，就是用過後一定要拉一拉鍊子，或按一按鈕子，讓水流下來，把馬桶冲洗乾淨，不要讓後來的人掩鼻而過之。這件事看來雖簡單，但却複雜。連認爲中國沒有抽水馬桶就是野蠻的象徵的留學生們，當他們還沒回國的時候，就常常因爲用過馬桶後不放水冲洗因而被外國房東趕出來。他們回國後怎麽樣呢？這我有點說不上來。反正在我們中國，只要有抽水馬桶的地方——我先聲明，這種地方恐怕只有上等人纔能住——就難免有上面說的那種現象。從前一位廁所詩人有兩句名句：「板斜尿流急，坑深糞落遲」。這多麽有詩意？拉鍊子，按鈕子，抽水，眞未免有點太「散文的」了。雖然有點氣味，但「入鮑魚之肆」，久了也就嗅不到了。我想恐怕只有這樣有詩意的地方纔是我們中國人安身立命之處。

同抽水馬桶可以相提並論的是有自來水的白瓷洗臉盆。這也是從西方來的玩意兒。臉盆當然我們從很早就有，雖然不是像西洋一樣裝在牆上上面有冷熱水龍頭的。顧名思義，臉盆當然是用來洗臉的。但據我所知道，正像中國的許多官吏，牠也有兼差。普通是用來盛什麽東西，也可以用來洗菜和麵。有的人早晨用牠來洗臉，晚上再用來洗脚。這我總覺得有點不雅，大概可以算是很下乘的了。不過比這更下乘的還有。我在中學的時候有一位住同屋的同學，他的臉盆，早晨用來洗臉，晚上洗脚，夜裏小便。每天早晨起來的時候，先到廁所把小便倒掉，稍稍用水一洗，立刻就再倒上水洗臉。一天早晨他起得比較晚一點。工友進來送臉水，看到臉盆裏面有黃色的液體，以爲不過是茶水什麽的，就把熱水倒在裏面。這位同學起來一看，心裏當然比誰都明白；但又懶得再喊工友。於是拿過手巾肥皂來，就用手往臉上捧水。臉上的汗毛一根都不動。我一直到現在還佩服這位英雄。

西洋來的有自來水的白瓷洗臉盆到了中國以後是不是得到同樣的命運，我沒有看見，不能亂說。但牠們的命運却也不太好。我們中國同胞强迫牠們兼差。兼了多少差，我沒有統計，也不能亂說。有一種差使却很普遍，到處可以發見。我去年夏天在南京一個國立什麽館住的時候，最初因爲人還不多，大體還過得去。後來人漸漸多了，每天早晨到盥洗室去洗臉的時候，總發見白洋瓷盆裏面滿是水菓皮，花生皮，喝過的茶葉；開了自來水，不用膠皮塞，水也不會流下去。下面裝的洩水的管子等於虛設。到了北平也發見同樣的現象。我們宿舍裏盥洗室裏的白洋瓷盆也永遠不往下漏水，裏面仍然是水菓皮，花生皮，喝過的茶葉。貼了佈告，仍然沒用。看來恐怕還是我們的國粹老瓦盆好，可以隨處挪動。即便裏面丟上水菓皮什麽的，只須拿出來一倒，立刻就又乾淨了。這不比裝在牆上有冷熱水龍頭的永遠不能挪動的白洋瓷盆好得多麽？

我開頭說到，我不懂什麽是西化問題，只能舉幾個實際的例子。現在例子舉出來了；但這與西化問題究竟有沒有關係呢？我想不出來。想來想去，自己也有點糊塗起來了。在糊塗之餘，我忽然作了一個夢。在夢裏有人告訴了我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外國教授，因爲看到人們天天吃猪肉，但猪的本身和牠住的地方却實在有點不乾淨，這樣的肉吃到肚子裏當然不會好的，於是就替猪們建築了一座屋子，四壁潔白，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地上還舖了洋灰。洗澡吃東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器具也都漂亮潔淨。把猪們引進去以後，滿以爲大功告成，心裏異常高興。但過了不久，猪却接二連三地死起來。他以爲猪本身有了病，於是把這羣死猪拖出來，把屋子消過毒，又引進一羣新的去。但過了不久，猪又接二連三地死起來。現在這位教授只好去找獸醫了。檢査的結果是因爲過於興奮不安，心臟擴大而死。原來猪們看了這樣潔白的牆這樣乾淨的地，這樣充足的光線，心裏怕起來，日夜坐臥不寧，終於死掉。

故事到這裏爲止。但這故事離題確有點太遠了。難道這也會同西化問題有什麽關係麽？這我說不上來。正面看西化問題，我沒有這能力。側面看呢，仍然沒看出什麽道理來。既然在糊塗之餘在夢裏聽到這故事，就把這故事寫下來作個結束吧。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北平

（文內「錶」字缺乏，概用「表」字代替，乞諒！——印刷所）

訂閱諸君：來函續定或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辦理。

文藝

說「回家」

錢鍾書

中國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禪宗，每逢思辯得到結論，心靈的追求達到目的，就把「回家」作爲比喻，例如「歸根復本」，「自家田地」，「窮子認家門」等等。像「客慧」，「客塵」這些名詞，也從「回家」這個比喻上生發而出；作客就是有家不歸或者無家可歸，換句話說，思想還未徹底，還沒有眞知灼見。楞嚴經卷一憍陳那說得明白：「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子書佛經以及宗門語錄裏這類言語，多不勝舉，姑引一個比較被忽略的例子：「李公晦誌問予云：『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如何看？』予曰：『惜他你迷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今人以「止」字爲上章「功虧一簣」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節引明王肯堂筆塵卷一）。

這個比喻在西洋神祕主義裏也是個基本概念。新柏拉圖派大師發洛克勒斯(Proclus)把探討眞理的歷程分爲三個階段：家居，外出，回家(Epistrophe)（見英譯本Elements of Theology第十五章，參觀W. Wallace: The Logic of Hegel第三八六頁又W. R. Inge: Philosophy of Plotinus第二冊第一四五頁）。黑智爾受新柏拉圖派的影響，所以他說思想歷程是圓形的，首尾回環。近來文學史家又發現德國早期浪漫主義者也受新柏拉圖派的影響，我以爲諾梵立斯(Novalis)下面一句話就是好例證：「哲學，實是思家病，一種要歸居本宅的衝動」(Die Philosophie ist eigentlich Heimweh, ein Trieb, ueberall zu Hause zu sein)（見Fragmente第二四節）。英國文評家裴德(Pater)也有相似的說話；他看過諾梵立斯，未必是無意的暗合。

中西比喻的相同，並非偶然。道家，禪宗，新柏拉圖派都是唯心的，主張返求諸己，發明本心。這當然跟走遍天下以後，回向本家，有點相像。不過，把唯心的玄談撇開，這比喻還是正確貼切的，因爲它表示出人類思想和推理時一種實在的境界。

回是歷程，家是對象。歷程是回復以求安息；對象是在一個不陌生的，識舊的，原有的地方從容安息。我想，我們追思而有結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時的心理狀況常是這樣。

正像一切戰爭都說是爲了獲取和平，一切心理活動，目的也在於靜止，恢復未活動前的穩定(Restoration of equilibrium or Stationary State)（參觀Rignano: Psychology of Reasoning英譯本第二至四頁）。雖見疑難，發生欲望，激動情感，都是心理的震盪和擾亂。非到這震動平靜下去，我們不會舒服。所以疑難以解決爲快，情感以發洩爲快，欲望以到達爲快。思想的結束是不復思想，問題有解答就不成問題，懷疑克伏了而成信仰，或者坐實了而成懷疑主義——那是把懷疑在心裏養家了，使它和自己不再搗亂。假如一時得不到結論，就往往人云亦云，盲從現成的結論，或者哄騙得自己把這問題忘掉，彷彿根本沒有這會事。總而言之，人心遭遇困難而感覺不安，就用種種方法，消除困難的感覺以便回復到心安理得。當然另有新的困難會發生，不過對於這個已解決的困難，心是一勞永逸了。樂記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自從莊子德充符天道兩篇以來，我們常把「止水」、「靜水」來比心的本體。剝去一切神祕玄妙的意義，本心像「止水」這句話跟西洋心理學所謂「意識的流水」，並不相反。「止」可以指上面所說的安定情境。心有無本體，不必討論；心的基本要求是儘量增加無所用心的可能，獲得暫時的或某方面的安穩。精神上和物質上麻醉品——例如酒和宗教——的流行是個間接的證據。

所謂回復原來，只指心的情境(State)而說，心的內容(Content)經過這番考索，添了一個新觀念，當然比原來豐富了些。但是我們千辛萬苦的新發現，常常給我們一種似曾相識，舊物重逢的印象。我們發現了以後，忍不住驚歎說：「原來不過如此！」巴斯楷爾的詭論：「假使你還沒有找到我，你決不肯來找我」(Tu ne me Chercherais pas si tu ne M'avais pas deja trouve)，就指此而言。據研究思維心理者的解釋，這個結論在被發現之先，早在我們的潛意識裏醞釀盤旋，所以到最後心力圓滿，豁然開朗，好比果子成熟，跟我們不陌生了。這種認新爲舊的錯覺，據我所知，柏拉圖拈出最早；他在對話Meno一篇裏把學算學來說明人類的知新其實是憶舊(Anamnesis)。哲學家和文學家自述經驗，也有同樣的記載。各舉一例，以概其餘。方德耐爾(Fontenelle)皇家學院史序說，眞理在人心裏現露的時候，竊竊意地來；雖然我們第一次知道它，倒好像不過記起了舊事(S'en Souvenir)。濟慈在一八一八年二月廿七日給泰勒(Taylor)的信裏說，好詩句彷彿是回憶的舊詩(Appear almost as remembrance)。至於神祕的宗教經驗裏「如獲舊物」的例子(譬如五燈會元卷二十善悟一則)，更不用說。

照此看來，「回家」這個比喻，不失爲貼切。但無論如何貼切，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險就是給比喻誘惑得忘記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發出來的理論認爲適用於被比喻的原物。這等於犯了禪宗所反復警告的「認權作實」，「死在句下」，或方法論者所戒忌的把「假如」認爲「眞如」（參觀Vaihinger: Philosophie des Als ob第七第八合版二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六頁論每一思想的生命有三階段）。

許多思想系統實際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潛意識的「潛」等等。假使我們從修詞學的立場研究這些比喻的確切性，也許對思辯有些小幫助。

觀察文摘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原作者：傅孟真

原刊處：世紀評論第七期

國民政府自從廣東打出來以後，曾辦了兩件大事，一，打倒軍閥（這也是就大體說）；二，抗戰勝利。至於說到政治，如果不承認失敗，是誰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要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台。

宋子文第一次總持財政經濟，本也看不出他有什麼政治家的風度，然而當時總還有人寄望於他。第一，他雖然也有錢的不得了，當時人的心中，還總以為他是用他的政治地位，以「資本主義社會共同允許之方式」得來。在他手中財政政策改變時，沒有先加上一陣混亂，如孔祥熙在改法幣時上海金融市場的怪象，弄得中外騰醜。第二，那時候國內企業在自然進步中，上海銀行業在發展中，我越借錢，銀行越要借給他，挾着政府力量擴大的憑藉，一切滿意稱心。第三，那時候他雖然做到了財政經濟的獨裁者，還並未作行政院長，「總率百揆」（孔祥熙作壽的話），他的深淺，世未盡知。接着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興』（這是一個什麼人送孔的壽聯），幾乎把抗戰的事業弄垮，而財政界的惡風遂為幾百年來所未有（清末弈劻有貪污之名，然比起孔來，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凱時代所用的財政人員，如周自齊周學熙皆謹愼的官僚，並沒有大富），上行下效，誰為禍首罪魁？於是宋氏名聲頓起，「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

說他這幾年走下坡路的行事，和國家人民也隨着他走下坡路的損失，真是寫不盡，只把他最荒謬之點分解一下：

一、看他的黃金政策。他上台最初一件事 是給以前買金子者一個六折。這中間，有小公務員，小資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資本者。當時大公報還是有條件的贊成，我也一樣，寫了一文，載大公報，強調政府在戰時可以徵用私人的資本，但須用累進的辦法，尤其是再想法子找大戶。前者的原則是，國家為戰爭籌款，必須有錢者出錢；後者的原則是，扭貧不能在窮人身上。現在想起來，王芸生先生和我，真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累進辦法，在參政會並且屢次提出過，我們強調他更改，財政當局說，大戶買時化小戶，無法子分，爭執不得結果。假如照那時他的說話，已買者尚可收回，未買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來，有一天拋五噸，經常是每天幾千條或幾百條，真正做到他的「自由貿易」的原則！然而今日如此「自由」，當年何必「充公」？金價的波動，一買幾千條的大戶是誰？豈皆不能查出？報載最近風波之掀起是山西幫，傳說是孔宋門法，二公本無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間？是不是因為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屬，一大組合（如美國報所說："Soong Combine" "Kung Combine"）而無從下手？如其不然，中央銀行賣金子的鐵幕何不可以為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揭開？我們國家是不是一個金子國，取之不盡的？如其不然，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吸收遊資？是不是能和整個經濟政策配合？一旦用得差不多了之後，何以善其後？如果今日之「自由」是，則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年之「充公」是，則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縱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無辦法，無見識，無原則。孑孑孫孫要還的黃金債，他這樣子玩，玩得領導物價，不特不足平抑物價，反而刺激物價，紊亂物價。

二、看他的工業政策。 抗戰勝利，他宣言曰，後方工業，無法保持，這是事實。但總要仔細檢點一下，那些確有設備，那些只是玩槍花，分別情形，擇好的收買其設備，以答謝其自滬遷川贊助抗戰之熱誠，這也不是太難的事。然而他一筆抹殺，不分清紅皁白。所有收復區敵僞的工業，全部眼光看在變錢上。有利可圖者收歸「國有」，無利可圖者「拍賣」，於是工廠一片停止聲。去年一年，上海小工業，停頓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決。這是失業的問題，即最嚴重的政治的問題。他毫無根本辦法，聽說新任經濟部長，本有一個「收購成品」的計畫，如生產局。他置之不理：僅僅貸小款，這是把錢投入大海的，比投大海還糟，他們拿去，好的屯積，壞的又是黃金美鈔，搞政府的亂。省小錢於前，花大錢於後，忽關頭於前，無所措手於後，[illegible]病的辦法不做、添紊亂的辦法做去。年前年後，一切一躍一倍，最近一躍幾倍，還不是更要多發鈔票？聽說他在做了行政院長後，第一次出席院會，說：計劃不必行者，即不付錢，減了還是賣錢；計劃可行者，不必減他錢。這是神智開朗的話，何以行起來並不如此？為少用法幣，抓得緊，是對的。然而要有經濟政策，使人不失業。無經濟政策之財政政策，是玩不轉的。發大票子，專選年關；出口加補助，不看美英法律。前者毫無常識，後者毫無知識。再由他這樣下去，三個月後，景象可想，也不忍想。

三、看他的對外信用 美國人有許多話也是亂說的，但嚴重的話，出於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個明白，為國家留體面。參帥的經濟顧問，說他如何如何，他憤然「更正」，那個人又說，宋如不承認，我舉出事實來，所謂(Soong 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響了。又如美國紐約「下午報」說他把聯總送中國醫院約調節溫度器幾架搬到自己家裏，這幾件東西究竟在那裏，他也不弄明白。大凡一個上軌道的國家，一人縱經商，一經從政，須擺脫商業。偏偏孔宋二公行為如此，公私雜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我向社會廣泛提議，如立法院、如參政會，以及一切人民，都該徹底調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國外，所有豪門權族之「企業」是些什麼內幕。他們的營業範圍如何？他們的外匯得自何處？

四、看看他的辦事。 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長部變成奴隸，或路人。一個主管部的事，他辦了，部長不知，看報方知之，真正偏勞得很。各部長建議，置之不理是最客氣，碰釘子更尋常。這是他有興趣的部。如無興趣的部，則路人相待，反正要錢無錢，說話不理。他平常辦事，總是

三幾個秘書，在上海，總是三幾個親信，還有他的三幾個「智囊團」，行政大事盡於其中矣，國家命運如此決定矣。

五、當政的人，總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至於他的外國文化，儘管英國話流暢，交些個美國人是決不登大雅之堂的。至於他的態度，可舉兩件一輕一重的事為例：他大可不請客，既請客，偏無話可說，最客氣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夾菜，此之謂嗄客，非請客也。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宋子文的失敗

原作者：傅孟真

原刊處：世紀評論第八期

論宋子文必須論到孔祥熙，他倆雖然是對頭，然而確是今天悲劇裏的雙扇活寶貝。孔是細大不捐，直接間接。宋則我生你死，公私一齊攪亂來把持。前者貪慾過於支配慾，後者支配欲過於貪慾。但是兩人絕對以買賣為靈魂。尤其顯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已，買賣在公。抗戰時期，孔當政，大家要管制經濟，孔連說不行不行，要是管制，還有買賣嗎？沒有買賣，還有國家嗎？……諸如此類。等到蔣主席也要管制了，大家吵的凶了，他是官僚派，也說管制，但心裏全不如此，面從背違，弄得一陣一陣紊亂。最後還說，你看，原來不該管制的。宋也是根本相信自由買賣的。他的自由買賣的原則是這樣：（一）中國人談不到管制，凡談管制的都不是財政政策。（二）理想的財政經濟，是Sound business。（三）自由買賣在我是絕對的，我要買你的什麼，你便須賣什麼，我要賣國家的什麼，我就賣什麼。（四）控制一切外來物資和錢鈔，無論是買的，借的，或捐的。

財政政策必須以經濟政策為基礎，沒有經濟政策的財政政策是無根的。請問宋與孔，有經濟政策嗎？接收日本工業，應付淪陷區工業，無論官營民營，總應該不讓大家關門。可是他只想收入，不想經濟，除把有利的拿去外（如中紡），便任其死滅。經濟走了絕路，財政必然也走絕路的。當勝利後，後方工業家要求這個那個，大多也是想分贓的，又有些人要分敵偽工廠，也是為私的，宋子文不給他們，可以，但須拿出一個辦法來。這辦法并不難，就是不要拆散日本人的生產系統，使各單位不存在，也不必組大托辣斯，如中紡。由政府收購其製造品，貨有定價，標有標準。這當然選擇若干主要的工業，不是一切都買，而且不行的廠也可天然淘汰。這樣也許有貼補性質，但比起貸款來好得多，因為貸款不特不足以助工業的生存，反而助長屯積，助長黃金外匯的投機，這次黃金潮，其中用來的資本，不少國家行局借出去的。收購成品自然賠錢，但工業家維持着，能吸收游資，不會一翻幾倍，弄得連印鈔票都不夠本。總而言之，他對於工業，漠不關心，已到極點了，如久大永利的工業，是些規矩人辦的，是很替國家爭面子的，因為他無利益，竟不予協助，反而摧殘，這等於摧殘國民經濟。

舍經濟而論財政。財政是要多收入。中紡公司的組織，原與國民黨歷來標榜的口號「輕工業民營」違背，他的說法，是增加政府收入。然而仔細看看，何嘗有賺錢這回事？第一、美棉以法價結外匯，在中紡，利益極大，在國家，擔負好大外匯。第二、機器（一百五十萬錠子）全無代價，房子生財全是拿來的。第三、補充機件，外匯取之裕如。這樣算賺錢，以裕財政，欺人乎，欺天乎？政府為他的收入之益，遠不如為他外匯擠貨之害。中紡成立「賺錢」後，大家繼續吵，他於是將計就計，說兩年後改歸民營。兩年的說法，算到今年底，卽應實現，他的妙法來了，不是各廠合理的分開標售，而是作為一個整單位出售，那麼就是說，他的建銀公司又來伸手抓住了。試問這樣大組合，用人行政全由他，除非他自已或他的一派，誰敢來投資？大凡托辣斯之組織，總是拿別人（小門小戶）之錢，作他自已（豪門大戶）之用的，只要能取得百分之五十股，便是絕對控制，事實上，有三分之一，也足控制了。分開來賣，有人出錢，因為這是利之所在；藉此可以收攏的法幣還在黃金之上。若將一百五十萬錠的大組合，合起來發股票，人存戒心，誰來捐款？這個股票說，和他要接收德商顏料商標，是他目前的兩大陰謀。國人要事先嚴防，擊碎他，更該是清算他的建銀！

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那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和黃金最多的人，卽發財最多的人。抗戰期內，外匯為一與二十之比，行了好幾年，直到勝利後，比起貨幣對外價值，相差極鉅。戰後初定為二〇二〇，復又改為三三五〇，也還不及實際價值。戰時黃金售價仍值萬餘元，後改為二萬元，又改為三萬五千元，戰後乃至十萬，二十多萬。維持極長的時期，並且永遠維持着比物價便宜很多的水準。這樣辦法，孔行於前，宋繼於後，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曹隨」。這樣辦法之禍國，有直接間接兩面。直接的說，這樣低價的外匯，很少一般人所能買到，尤其是大量的，必須有力的方能購得，因為是要經過「審核」的。權貴勢力愈大的，收購的愈多，這樣便宜法，最便宜權貴。連帶着，黃金消耗到這個程度。這都是我們子子孫孫的債，這也是盟邦為我們打仗的借貸，我們在二公這樣辦法之下這樣消耗了。還有間接而更不了的呢。美金戰前一元等於法幣三元三角許，後來美金也稍貶值，今天美國生活指數也上漲百分之二十三十不等。這樣算來今天一塊美金在中國的購買力，應當等於戰前法幣至少二元五角，實尚不止此。今天假定生活指數是萬倍，美金一塊的購買力，應當等於二萬五千倍，卽法幣二萬五千元。然而今天定為一萬二，大家還說太高；這是太騃，不是太高，三萬也不為高。美金如此，金價亦然，因為兩者有連繫。在這樣外幣賤，國幣貴的情形下，入口極易，出口極難，一懸數倍，簡直要斷絕中國貨的出口，大開外國的入口，豈特入超而已，簡直要一個是無限大，一個是零，這真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了，何年恢復，真不可知。誰開創這個局面？孔祥熙。誰繼承這個遺志？宋子文。他倆這一着，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

再說工商貸款。工款可貸，商款原是不可貸的。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政府的四行兩局的工商貸款，幾乎全為有力之人獲得。照道理，貸款應給有希望、有成績、有作用、有信用、能自身規矩的工商業，尤其是能這樣而環境上受窒息者。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

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澈底毀壞中國經濟，澈底掃蕩中國工業，澈底使人失業，澈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於國外！

編輯後記

從這一卷起，假如每期有多餘的空白地位，我們將寫一點編輯後記。

本刊休息了兩個星期。但這兩個星期却是一些狂風暴雨的日子。國家大事此處不說，單說本刊，原來有一點小小計劃的，也給這陣金潮的風暴吹掉了！我們所受的最大打擊是紙價的暴漲。二月十六日大公報「出版界」刊載五個月來的紙價(每令)如左：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二萬六千
十一月一日	二萬五千
十五日	二萬五千
十二月一日	二萬二千五
十五日	二萬六千
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三萬九千
十五日	四萬
二月一日	四萬九千
七日	七萬二千
十一日	十二萬
十四日	十三萬

實際上紙價最高曾到過十六萬一令，比從前漲了五六倍；這情形眞可怕。排工印工也都漲得可觀，去年十月排工每千字七元，現在小五號字每千字漲到一萬八千元，六號字漲到二萬一千元；印工上漲的比例與排工同。我們在第一卷快完的時候，還打算增加篇幅，增闢欄數，以求內容的更加充實，所以在二十三期上公告徵聘編輯，並決定將第二卷的售價增爲一千元一册。現在都發生了困難。目下上海一般刊物，二十四頁者均售一千五百元，本刊本期廿八頁亦僅售一千五百元，我們當儘量抑低售價，以減輕讀者的負擔。祇要紙價不再向上漲，排印工不加，我們願意極力穩定我們的售價。

× × ×

本刊雖然休息了兩個星期，但在這兩個星期中，本社同人仍未得到休息，事實上反而格外緊忙。直接定戶的清單都在這兩個星期內一一結算，分別寄出。我們又在這兩星期內向各方面推動徵求直接定戶的工作。我們願意向讀者及各地同業報告：各地同業所拖欠我們的貨款，已達一千萬元以上！這個數目對於本社實是一個難於負擔的數目。目下的成本又如此激增，所以我們從這期起，不得不極力控制印刷的數量，各地同業拖欠貨款太多的，我們已無法繼續發貨，至少不能照過去的批數配貨，除非各地同業能給繼續將貨款匯下。因之，各地的零購讀者，恐還不能像過去那樣容易購到本刊；我們還是呼籲各地的零購讀者趕快向本社直接定閱。

× × ×

我們徵求直接定戶的單子分發出去還祇有半個月，但已有良好的成績。我們不得不在此以最大的熱忱向一切支持我們的讀者（其中大部是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戶）表示我們最誠懇的謝意。他們眞是一片赤誠，支持我們。有的將我們寄去的定單用完了，還要求我們再寄去，以便繼續代爲徵求。有的介紹定戶時，附有長信，或者鼓勵我們，或者貢獻許多可貴的意見。在這短短的半個月中，我們的定戶已增加了六百多人，上次報告的數目是二千七百○九號，現在截至二月二十五日，已達三千三百號了（六百名的數目不算大，但是在今日中國的雜誌界中，要在短短半個月內增加六百名定戶，是何等的不容易呵！）每天的信件極爲擁擠，這種擁擠的情形我們相信祇是一個開始，可能還要繼續一個時候才能回復到平常的狀態。我們希望能在三月底以前，達到四千五百號，我們希望各地還沒有幫助我們介紹定戶的朋友們，能加勁努力一下。當大家出力幫助了我們以後，他至少在精神上會感覺到：對於這個刊物所獲有的榮譽，他也是有了一份的。

× × ×

還有幾件事我們在這兒報告一下：（一）我們在第一卷二十四期上所附的「讀者意見書」，承蒙各地讀者批註意見寄下，非常感激；現已收到一百四十餘紙，尚未寄下者，請於本月內寄出，我們希望在四月份的本刊上，發表一個統計。（二）自本卷起，除了我們已與撰稿人約定的長稿以外，希望避免收受長稿。我們新增了「週末閒欄」和「觀察文摘」兩欄，而篇幅有限，不得不將「特稿連載」一欄暫時停止。（三）爲了經濟篇幅起見，各地特約記者撰寄通信，希望儘可能的不要超過三千字。（四）自本卷起，我們將原來是廣告地位的「封裏」，不刊廣告，改刊讀者投書。我們歡迎讀者投書，但請勿長篇大論，每信能不超過五百字者最好。（五）過去本刊所刊文字，常蒙國內報紙雜誌轉載，我們希望各地的報紙或刊物轉載本刊文字時，能註明「轉載某卷某期觀察週刊」字樣，以明來源。

× × ×

關於這一期的內容：梁漱溟先生提出了兩個挽救目前混亂政局的原則。傅孟眞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第一第二兩篇刊南京出版的世紀評論，現一併摘刊於本期的「觀察文摘」；第一篇曾由上海大公報轉載，但本刊的讀者散佈於大後方者極多，未必能讀到南京的世紀評論或上海大公報，故本刊仍予摘載）。錢瑞升先生還是第一次給本刊寫稿。錢先生在過去一卷中，雖因生活關係，未能寫稿，但仍經常和本刊保持接觸。梁先生以後可能爲本刊多寫點文章，傅錢兩先生在最近還有文章寄來。他們都已把擬寫的題目開來了。金潮發生後，我們約了簡貫三莊智煥兩位先生寫評論文字。簡先生在立法院中，對現行財政情形，頗多糾舉，莊先生過去在經濟部任司長多年，對過去物價管制這一套，深知內情。我們約簡先生寫稿時，請他從政治的角度下筆，約莊先生寫稿時，請他從經濟的技術的角度下筆，兩篇文字很配合起來，至於看法，則各從其主，不必強同。季羨林先生的筆法叢來是不默的，他還有許多幽默的小品，在後面。錢鍾書先生，若把各種條件總加起來：他是今日中國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學的人。他造詣的廣博精深，允爲同價器可。他的文章另有風來，獨具一格。下期的文章已大致編定，此處暫不預告。（安平）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註冊商標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嗶嘰
健美呢
條素絨
縐紋呢
大家布

商標
醒鐘
拳豐
美球
月美
健美
美亨
大路
女學生
團圓
撲蝶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衖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

本刊啓事

(一)第一卷合訂本上冊(第一至十二期)下冊(十三至廿四期)業已出版
(A)售價：每冊壹萬貳千元
(B)寄費：1.快遞三百五十元
2.航掛三千五百元
(二)零購第一卷各期(惟創刊號已無存刊)每本售壹千元，寄費另加。

聯合畫報兩大巨著

中國抗戰畫史

預約 月底截止

曹聚仁 舒宗僑編著　中外攝影記者五十人合作

本書搜羅「九一八」至最近珍貴照片千餘幅，文字四十餘萬字，地圖數十幅，彩圖十餘幅，直接文獻內幕祕聞百餘種，爲抗戰以來最完備之圖文並茂的史書。

預約優待辦法

一、自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延至三月二十八日止爲預約期間，定四月下旬出版。
二、預收定費每部三萬二千元，出版後照定價八折計算，多退少補。航空寄出另收一萬元，平寄二千五百元，多退少補。
三、預約者得享以下權利：一、憑預約單購「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可享九折優待，優待部數與預約部數同。二、預約者需要時，編著者可親筆簽名，作爲紀念。三、預約者訂閱「聯合畫報」冊付自由定戶費（現每戶肆萬元）後，照九折扣算。

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

舒宗僑編著　每部五萬元(航寄一萬元，平寄二千五百元，多退少補)

社址：上海百老匯大廈　聯合畫報社　電話 四四六八〇 四五六五九